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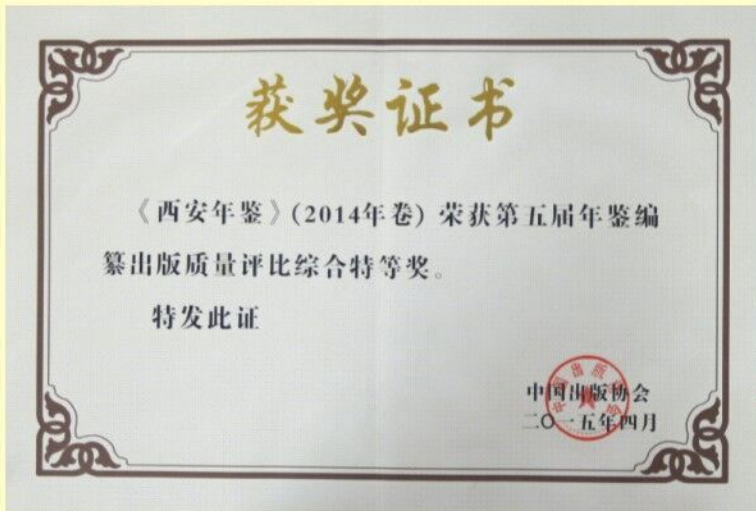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

西安地方志



2015·2

(总第233期)



在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年鉴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中，《西安年鉴（2014）》连续第四次荣获最高奖项“城市年鉴综合特等奖”，并且首次实现“大满贯”，在“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装帧设计”三个单项奖评比中均取得“特等奖”。



陕西省首部开发区志《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志》正式出版

2015年4月9日，高陵县志（1990—2010）复审会召开。



目 录



西安地方志

2015·第2期

(总第233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历代名人与西安

善无畏——来自印度的高僧 (3)

学术交流

对地州区县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的点滴思考

..... 姚敏杰 (5)

洮河的读音 张可道 (16)

人物春秋

著名抗日将领——孙蔚如 (17)

史料钩沉

先秦考察官吏期限三年 (21)

古代御史如何反腐 (23)

百团大战之五大谜团 (26)

中国解放区军民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31)

西安风情

西安城门趣闻(十)——朝阳门 (34)

西安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兴教寺塔
..... (35)

我们的村落

五一村(五一社区) (36)

西关村(西关社区) (4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户县龙窝酒手工酿造技艺 富小云 整理 (42)

文史拾趣

- 羊年说羊 (44)
- 中国古代公务官员的退休年龄 (46)
- 宋朝借高利贷没钱可押妻女 (48)
- 乾隆皇帝组织编纂四库全书 (49)

志鉴动态

- 《西安年鉴(2014)》荣获第五届全国年鉴编纂
出版质量评比综合特等奖 (50)
- 全省首部开发区志《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志
(1993—2012)》正式出版发行 (50)
- 《高陵县志(1990~2010)》通过复审 (51)

知识窗

- 最先和西安结为友好城市的外国城市 (52)
- 西安最早形成回族聚居的时代 (52)
- 为什么人民币中没有 3 元? (53)
- “十羊九不全”的历史来历 (53)
- “越明年”到底指哪一年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 清明夜 (唐)白居易 (56)

解字

- 刀 (43)
- 刃 (52)

名句欣赏

- 【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等五句 (22)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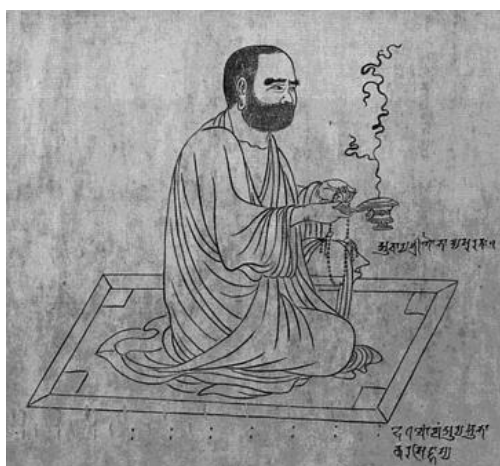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www.xadqw.cn/di-fangzhinew/>

index.jsp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善无畏祖师供养图

善无畏—— 来自印度的高僧

在来到唐长安城的人群中，善无畏是印度的重要代表。

善无畏(637—735)，梵名音译戍婆揭罗僧诃，或输波迦罗，直译为净狮子，意译就是善无畏。中印度摩揭陀国人，刹帝利种姓，十三岁继承了东印度的乌荼国王位。后因兄弟不服，发动叛乱，于是善无畏带兵打败了举兵夺位的兄弟。因感悟世间无常，善无畏赦免了他们，并宣告群臣：“向者亲征，义断恩也。今以国让，行其志也”，最后让位于其兄长，毅然选择出家。其母开始不同意，出于无奈，也只能接受，于是将传国宝珠给了他。

谁成想，这一出家，同样非凡。当然不是因为他是曾经的国王，而是他在佛教方面的巨大成就。

出家之初，善无畏先来到南印度的海滨，在一座寺院学习法华三昧。后来到中印度，修习禅法，并且学习了许多经论。在中天竺的摩揭陀国，得到国王召见，而王后恰好就是他的姐姐，他们得知善无畏让出王位出家的事迹，非常钦佩。善无畏在那里遍学经论，“发三乘

之藏，究诸部之学。”(《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在当时印度的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毅然把传国宝珠舍献给了寺院，镶在大佛的额头，使其更加光彩夺目。他的虔诚和学问也得到该寺著名长老达摩鞠多的赏识，于是收为徒，传授密教诸法，并为他灌顶。因学有所成，被尊为三藏法师。随后又遍访佛教圣迹，并化外道后启程东行。善无畏承乘密教大旗，游学讲道，沿途中不断对各派学说的人破滞析疑，广度众生，大宣密教，从而使密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后来，达摩鞠多认为他的水平已经足够高时，建议他到震旦(中国)弘法，于是尊师教东行。临行前，收集了重要的密教典籍，为后来的弘法做好了准备。

善无畏的东去弘法之路漫长而不平坦，经过北印度迦湿弥罗、乌苻等国，到了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应突厥可汗之请，讲《毗卢遮那经》。然后再前行，通过天山北路，到达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宝应)。善无畏长途跋涉路过北印度境时，其东行的消息已被僧侣和商人传到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了长安，唐睿宗对善无畏不惜年迈东行传法的行为，十分感动。于是，专门派僧人若那和将军史宪，带着礼物出玉门关侯迎。

在大家的期盼中，善无畏于玄宗开元四年(716)带着许多梵文佛经，到达长安。其名气加上深厚的佛学造诣，受到唐玄宗的礼遇恭敬，被尊为国师。据说当时玄宗有意探知善无畏法术，让一位有名的术士与其较量高低。那位术士这样那样运行动作，而善无畏寂然不动，那位术士便手足无措了。满座人对善无畏无不敬仰，叹其神奇。玄宗又特设内道场，尊其为教主，玄宗之子宁王、薛王等从其灌顶受法，一时轰动朝野。善无畏先后在兴福寺南塔院、菩提寺、大兴善寺等处，翻译经典，教授弟子。

此间，带着对佛学的执著，他还注意多方寻找未翻译的密典梵本。先有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无行求法，游历南海、东印、中印各地，曾住大觉、那烂陀等寺闻法，并访求梵本。学毕回国过程中，途经北印病卒(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所收集的梵本，由同行者带回中国，存于长安华严寺。于是，善无畏和一行一同前往搜集，选取以前没有翻译过的重要密典数种。

密教的根本经典《大日经》，又名《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共七卷，由善无畏口译，一行记录而成。其后又由一行编纂，加以注释，撰成《大日经疏》二十卷。此外，还译有《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各三卷。

除此之外，其兼长工巧艺术，相传他自制模型，铸造金铜灵塔，备极庄严。他所画的曼

荼罗，尤其精妙。他这一法系的传布，对于汉地工巧艺术，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元十二年(724)，其随玄宗到洛阳，于开元十三(725)、十四年(726)间，在奉先寺译出《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等三种。

开元二十年(732)，善无畏请求返回印度。由于唐玄宗重视佛教，推崇其佛法，所以优诏慰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善无畏盛情难却，便留下来继续译经。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于洛阳大圣善寺圆寂，享年99。死后封赠“鸿胪卿”，葬于龙门西山广化寺。乾元元年(758)，李华撰《大唐东都大圣善寺故中天竺国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立碑于塔院之侧。

善无畏是中国佛教密宗的奠基人，所译经典28部53卷也全系密教经典。作为唐代密宗胎藏界的传入者，与金刚智、不空合称开元三大士，共同奠定中国密教的基础。

据说，善无畏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态度慈祥，从不以上师自居。因而受学弟子众多，入室弟子有宝畏、明畏，俗弟子有著名文学家李华，还有从学者智俨、温古、义琳以及新罗(今朝鲜)国的玄超等。其实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代佛学大师，到了那么大的年纪，所经国家众多，所经地域众多，历经世事多多。

真言宗在唐武宗废佛(845)以后，中土传承即以衰歇。惟善无畏所传胎藏部密法，后由不空的弟子慧果传于日本空海，而和金刚智所传的金刚部密法相并传习，在日本一直延续到现在。

编者按：编者按：本文系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副会长、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总结和颁奖大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该文对地州区县年鉴编纂具有指导作用，现原文刊发。

对地州区县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的点滴思考

姚敏杰

(2015年4月22日)

尊敬的许家康会长、各位工委会领导、各位年鉴界同仁：

去年年底，在中国版协年鉴工委的认真筹备和精心组织下，在各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第五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活动已经圆满完成，今年2月份正式公布了评奖结果。受版协年鉴工委和许家康会长的委托，由我在这次杭州会上就地州区县年鉴编纂出版质量作主题报告。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从本次评比总体情况来看，地州区县年鉴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规范、创新和发挥地方特色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涌现出《南海年鉴》《南山年鉴》《金州年鉴》《奉贤年鉴》《越秀年鉴》《萧山年鉴》《大丰年鉴》《临安年鉴》《大理州年鉴》等一批质量上乘的年鉴。上一届的综合特等奖年鉴《武进年鉴》《张家港年鉴》《浦东年鉴》《栖霞年鉴》继续保持了

高质量的编纂，蝉联综合特等奖。在这次评比中，有上述13家地州区县年鉴获得综合特等奖，比第四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结果多了8家，从一个侧面看出地州区县年鉴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我们在评奖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而且相当多的问题都是年鉴编纂中最常见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就必然影响我们年鉴编纂的质量。下面，我从以下五个方面谈一些感想和看法：

一、处理好规范与创新的关系，仍然是年鉴编纂实践中最基本的问题

规范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是年鉴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当然，也是年鉴编纂实践中永远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我从2008年起参加全国版协年鉴工委组织的各种会议，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次

●学术交流●

会议谈论的主题都离不开规范与创新的关系,可见处理好规范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在年鉴编纂实务中的重要意义。20多年来,关于年鉴规范与创新的探讨,形成了大量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对于年鉴编纂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这其中,我们版协年鉴工委的各位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首先要规范化上下功夫。规范化是年鉴的共性要求,它是年鉴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完善并为大多数人认同的编纂规定。人常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化就是年鉴编纂的规矩和要求,也是年鉴之所以成为年鉴的质的规定性。试想一下,目前全国公开发行的年鉴已经超过4000种,偌大的一个行业系统,如果没有规范化要求,各行其是,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年鉴正是在不断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恪守规范的年鉴编纂者,也形成了适应这种规范的年鉴读者群,从而使年鉴服务社会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另外,正是年鉴的规范化要求,才使得年鉴界进行公平公正的评比成为一种可能,才能在年鉴界建立起相对公平公正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多不胜数的年鉴中评比出高下优劣。客观地说,我们版协年鉴工委五年一次的年鉴评比,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对我们年鉴编纂规范化的有力推进,同时也是对年鉴规范化的最好检验。从第五届年鉴

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的内容和评分标准来看,主要是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装帧设计、检索手段和编校质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都有直观反映年鉴编纂规范化的内容要素。从获得综合特等奖的地州区县年鉴来看,其共同特点一是框架设计能够较好地贯彻年鉴体例,综合情况、动态信息、附属资料、检索系统四大部分内容完备,结构比较合理;二是条目编写记述重点突出,对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的把握和定位比较准确,反映也比较充分;有统一的设条标准和选材原则;遵循统一的内容要素规范;有统一的记述程序要求;体裁运用得当,文字表述基本符合规范;名词、名称和时间等表述统一、规范;标题中心词突出,题文相符。三是装帧设计注重实用,朴素大方、庄重而不奢华。四是检索手段先进,目录详及条目,编排得体。索引有一定深度,标引准确规范。相反,一些没有获奖的年鉴,都在规范化上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其次,要在创新上下功夫。创新是年鉴编纂的个性要求,它是年鉴在规范编纂的基础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说规范化要求年鉴在框架结构、文体文风、条目编写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话,那么,创新则是要赋予年鉴以新的活力,让年鉴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满足人们的使用和阅读需求(包括对书籍阅读的审美需求),力求常编常新。规范和创新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在年鉴编纂实践中,很多人对“规范”这个概念觉得好理

解,对创新觉得不好理解,或者说觉得不好操作,觉得无所适从。其实,简单地说,创新就是因事物变化所做出的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古人叫“与时偕行”,今人叫“与时俱进”。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鉴如果能够捕捉到事物的变化,并能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把这种变化全面准确地表现出来,就实现了年鉴的创新。在创新方面,全国不少地州区县年鉴也都做出了各种有益的尝试。主要表现在内容创新,体例创新,数字化创新等方面。从这次参评年鉴来看,好的年鉴都有其独到的创新之处,比如,《张家港年鉴 2014》在图表的使用方面有所创新,全书图文并茂,生动鲜明,令人耳目一新。在内容记述上,也有新突破。比如,在概况中以列表的形式介绍了消亡的自然村,并阐明了消亡原因,使人们对地名的变迁能够全面、准确的了解。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保护村落文化遗存,希望“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今天,《张家港年鉴》能够做出这样的努力,实属难能可贵。这在年鉴编纂中是比较少见的,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武进年鉴 2014》注重年鉴的实用性,在检索手段上多所创新,编有主题分析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其“科学技术”类目,以详细的列表展示了当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及承担单位,而且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大大增加了资料的查阅功能,提高了年鉴的实用

性。《大理州年鉴 2014》在装帧设计上清新典雅,韵味独具,整体古色古香,富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奉贤年鉴 2014》注重突出地域优势,凸显商业特色,商业宣传力度较大。《萧山年鉴 2014》设立“重点企业和集团”类目,既起到了广告宣传效应,又避免了明显的广告色彩。在数字化方面,多数年鉴都有光盘随书附赠,部分年鉴还有网络版,丰富了年鉴的表现形式,增强了年鉴的实用价值。

二、框架设计仍然是贯彻年鉴编纂体例的重要遵循

框架是贯彻年鉴体例最重要的载体,具有框定年鉴内容,明确信息资料的归属和层次的作用。框架设计不但要系统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还要与时俱进,突出体现时代精神、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框架内容大致由综合情况、动态信息、附属资料、检索系统四个部分组成,要求四部分内容有机融合。资料门类齐全,一二三次文献配置合理,占比适中;资料分类科学、合理、严谨,层次清晰,等等。在这次评比中,框架设计部分占 27 分,分值相对较高。在这里,我想就框架内容中综合情况和检索系统两个部分做简要述评。

“综合情况”由地方的基础信息和年度内方方面面的概况构成。读者通过综合情况,应当能够大致了解一个地方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基本情况。中国版协年鉴工委许家康会长根据自身编纂、审阅年鉴的实践经验,以及多

●学术交流●

年从事年鉴理论研究,进行统计分析的心得体会,提出年鉴综合情况的理想比例,应该占到全书的7%。这个提法客观公允,比较科学,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但是,我们在评阅地州区县年鉴时,仍然发现不少年鉴的综合情况明显缺乏综合性,设置栏目偏少,内容单薄,无法全面反映地方基本情况。一本三、四百个页码的年鉴,综合情况只占到五、六页,如何能够反映一个地州区县年度内方方面面的综合情况呢?这种情况在我们评比中综合排名靠前的年鉴中也为数不少。当然,也有个别做得比较好的年鉴,比如,《张家港年鉴》,达到了24页,《大理州年鉴》为19页。

与此相关,需要提请地州区县年鉴注意的是,概况部分常常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未能把握年鉴姓“年”的特性,反映内容缺少年度概况,更多的则是基础信息;二是记述范围不全,不能体现年度全貌。突出表现为对地方基础信息和基本情况反映的严重缺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编纂者未能正确处理好概况内容和整个年鉴具体条目的关系。错误地认为,有了后面的具体条目,概况越简单越好,甚至可有可无。具体表现为或者概而不全,或者无法准确地取舍概况内容。于是,便出现了个别年鉴的概况条目除了一段大而不当的空话、套话外,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多数概况条目内容被拆分为小条目,有的条目甚至只有一两句话,削弱了内容的概括性和完整性。

“检索系统”是工具书的必要部件,在此次评比中,索引项占了3分,目的是希望年鉴编纂者重视编排索引。但是在参评年鉴中普遍存在索引简单化倾向,许多年鉴索引徒有形式,只是重复目录中的条目内容,没有编排二级索引,远远达不到条目和索引1:1.5的合理要求,也根本达不到让读者快速、方便、准确地查找到需要信息的目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年鉴编纂者未能从认识上重视索引编排有关。不少人认为,有了详细目录就行了,索引可有可无。实际上,索引具有与目录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任务。目录只是年鉴内容的逻辑排列,索引则完全是根据索引规则和要求重新组织年鉴内容,检索性更加精确,检索更加方便、快捷。高质量的索引编排,既方便读者查阅,又促进年鉴信息资源深度利用。一般来说,年鉴索引大致有六种:一是主题索引,二是条目索引,三是人名索引,四是机构索引,五是图片索引,六是表格索引。年鉴采用的索引种类越多,其检索性越强。从这次参评年鉴来看,绝大多数年鉴都编制了索引,部分年鉴还有两种以上的索引,如《武进年鉴2014》有四种索引,《张家港年鉴2014》《奉贤年鉴2014》《徐汇年鉴2014》各有3种索引。但也有不少年鉴虽然编有索引,但编制很粗糙,无深度,检索意义不大;更有甚者,个别年鉴至今没有编制索引。

今后,人们对图书检索系统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苛刻。有消息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

在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家出版基金和“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的评审标准中增加一条：凡是索引、注释不规范的图书一律取消评审资格。学术著作如果不做索引、不注明引用文献出处，将不能获得政府奖参评资格，出版基金不予赞助。由此可见，年鉴作为工具书不仅需要编制索引，而且需要编制出高质量的索引，从而使读者达到快速检索的目的。前不久，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人采访《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主编——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陆谷孙教授对好词典的标准，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好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仔细琢磨陆教授的话，要想编好一部查得率高的好词典，编制出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检索系统，一定是题中应有之义。

另外，有些地州区县年鉴在进行框架设计时，不是从地方实际出发，而是盲目照搬省市年鉴的框架，导致内容空泛，资料单一，缺乏个性和特色。主要表现是分类过细，部类太多。某些弱项加入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强设部类，结果是搞得不伦不类。正如莫秀吉副主任在去年常州武进会上所指出的那样，一部县级市年鉴也设立“社会科学”类目，但分目却是党史工作、地方志工作、档案工作，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条目编写仍然是年鉴编纂的重中之重

条目是年鉴内容的核心组成，是年鉴的血肉，所以说条目编写是年鉴编纂的重中之

重。在这次评比中，条目编写占 37 分，是四部分评比内容中占分最多的一部分。一部年鉴的质量优劣、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条目编写的质量和水平。在这次评比中，能够获得特等奖的地州区县年鉴，一定是条目编写做得好的年鉴；相反，未能在评奖中获得好成绩的年鉴，一定在条目编写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关于条目编写的基本原则和应该注意的事项，许家康会长在他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中，有专门论述，颇为周详，兹不赘。从这次评比中评委反馈的情况来看，各地年鉴在条目编写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有必要加以强调：一是设条标准随意，条目要素不全，资料缺失。条目要素不全，资料缺失，是编写年鉴的大忌。主要表现在概况性条目和专题性条目上。比如，有一个年鉴某项工作的“概况”，只写了“2013 年，xx 工作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经过全体从事该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就结束了，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在随意设置条目方面，我看到一个区级年鉴，将各级领导的名单列为该单位的第一个条目，甚至在【区长、副区长名单】条目后，紧接着列第二个条目【区长、副区长简历】，第三个条目列的是【区政府办公室领导名单】。还有把本该《政府公报》发布的消息单列成年鉴条目，比如，政府常务会的全部议题、政府发布的文件名录、干部人事任免文件名录，等等，都单列条目全部罗列。

●学术交流●

二是条目标题不够规范。(1)画蛇添足。例如：“政府议教工作”“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工作”“防流控辍工作”“教育改革工作”“校务公开工作”“日常防汛工作”“水土保持工作”“依法治水工作”，等等。上述条目标题的“工作”二字纯属多余，应当删掉。(2)中心词、关键词缺失。例如，“政协”分目中的“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做好提案工作”“开展联谊活动”，这三个条目标题就缺失关键词“政协”，应该补上。(3)中心词、关键词不够突出。例如，“创新资金管理”“提高财政收入征管水平”“开展政府债务情况审计调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这四个条目标题的中心词、关键词就不够突出。前两个标题应采用换位法，将动词后置，关键词(名词)前置，分别改为“资金管理创新”“财政收入征管水平提高”。后两个标题则宜采用掐头法，即将开头的动词删去，分别改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政府债务审计调查”。三是表述不直接，有修饰、浮夸、溢美成分。类似“极大发展”“跨跃式发展”“国内首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质量上乘”“世界一流”的虚饰的词语在有些年鉴中还随处可见。四是选词不准确。有些年鉴还常常使用一些虚拟、臆测、模棱两可的词语，例如“这个指标也许是近年来的最好成绩”“年度任务基本完成”“xx产量有所增长”“xx工程于最近竣工”等等。上述词语和句式似是而非，与年鉴文字的纪实性要求不符。五是文字措辞有夸张成分。例如，得了某项奖励，直接

说“获得xx奖励”就行了，却被说成“荣获xx奖励”、“获xx殊荣”；某种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直说“进入”、“进口”即可，却要渲染为“一举打入国际市场”或“产品占领了国际市场”；抓了某项工作，直接说“抓住”、“抓好”即可，却往往说成“狠抓”等等；加强对某种工作的领导，实说“加强”就可以了，却往往要说成“强化”等等，调整产品结构，直说就行了，却往往泛用“优化”。另外还有的年鉴用了一些空洞或一厢情愿的主观评语，如“获得好评”、“反映强烈”、“受到群众欢迎”、“得到全体称赞”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年鉴文风、体例要求的。六是开头、结尾有多余的铺垫。尤其是穿靴戴帽的套话、虚话在有些年鉴的综述和概况中都有所表现，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xx’的号召”等。有的稿件结尾时写道：“这既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而实行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要努力坚持的既定方向”；还有的稿件结尾时写道“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迈出更大的步伐”等等。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对年鉴的文风、体例了解、把握不够，把年鉴稿件混同于其他稿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了解掌握好年鉴体例、文风，按年鉴稿件的要求去撰写稿件。七是对事物的表述不完整。有的年鉴只提到“该行业xx企业是

首家改制企业”，但是全国的“首家”？还是全省、全市、全行业的？读者无从知道。有的年鉴民主党派部分也有类似问题，如“市委举办了党史知识竞赛”，弄不清是哪个市委、什么党史。另外，不少年鉴在表述时间时有“今年……”、“去年……”“一年来……”“今后……”“届时……”等不明确的时间概念。八是有的年鉴中存在大量不加注释的简称、缩略语问题。如：“全县 15 个单位实现‘三无’”、“全市大力发展‘三自’”、“总结推广了‘五小’治理经验”、“充分利用‘三电一厅’”、“实现一纳入五到位”、“一申报两公开”等等。行业以外的读者看得十分费力，甚至根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让读者一头雾水。九是数据资料前后矛盾。一般是综述或概况与条目中数据相矛盾；总数与分项之和数据不一致，有的年鉴提到“全年有 9 个单位实行股份制，分别是xx、xx……”结果只列出 8 个；有的年鉴列出“地区生产总值 2.2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1.2 亿元、第二产业 0.7 亿元、第三产业 0.2 亿元”，一计算累计只有 2.1 亿元。还有相关栏目之间数据有矛盾；各科类目与统计资料类目不一致；文字与表格不一致，等等。

上述问题在年鉴编纂中是带有普遍性的，涉及到我们撰稿人员的综合素养，体例贯彻，编辑加工，校对整理，审定等方方面面，也是最值得下功夫解决的问题。

四、彰显地方特色仍然是年鉴编纂的着力点

(1)做好框架设计，彰显地方特色。

地州区县级年鉴框架设计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千方百计突出地方特色，张扬个性。要强化地方的强项和优势，将地方的独到、独特之处，合理设计栏目，并适当安排版面，使年鉴富于浓郁的“乡土味”。年鉴只有体现地方特色，才能避免千鉴一面。农业大县要侧重反映农业发展情况；旅游大县要突出旅游接待、景区建设管理、旅游文化活动等内容；少数民族自治县则要在民族区域自治、民俗风情等方面多做文章。如《栖霞年鉴 2014》结合驻栖霞区的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较多情况，在“工业”类目中设立“部分驻区工业企业”分目；在“南京仙林大学”和“教育”两个类目中分别设置“进驻院校”和“部分驻区高等院校”分目；在“综录”类目中设“栖霞掌故”、“往事钩沉”、“邑人档案”等栏目，收录本地域特有的珍贵历史人文资料；卷尾的“魅力栖霞”，多角度、全方位、连续性集中介绍某一重大或独特的事物，2014 卷主题是“国之瑰宝——舍利塔”，地方特色非常突出。《秦淮年鉴 2013》以突出地方文化来设置框架，彰显地域特色，一是“秦淮风光”独立成栏目。集中体现了秦淮的历史悠久和文化积淀，是地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二是“商贸·服务业”栏目中设置“夫子庙商贸圈、大明路汽车街、晨光 1865 科技创意产业园”三个分目。体现本区域内的主体商业结构特征；体现地方政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保护老工业遗址中开辟了一种

●学术交流●

新的发展模式。三是“秦淮风光”栏目中增加“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分目。利用年鉴编纂的连续性、年度性特点,从规划、考古、建设等阶段跟踪记载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公园项目数年来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大报恩寺地宫关于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考古重大成果,让秦淮历史文化在年鉴中特色更加亮丽、更加醒目。《临安年鉴》在《专辑》栏目编有“重要信息发布”“文化礼堂建设”“作家王蒙到浙江农林大学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有效突出了年度特色和地方特色。除此,正文里还有《青山湖科技城》《林业》《旅游》等地方特色栏目。另外,《张家港年鉴》突出港口口岸城市内容设置框架,《浦东年鉴》突出开发区、招商引资、要素市场等开放型经济情况设置框架,都有效地突出了地方特色。

总之,地方综合年鉴要对地情做深入研究,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事物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强化反映,增强年鉴的可读性、资料性和实用价值。

(2)做好装帧设计,彰显地方特色。

装帧设计是鉴赏性和实用性的统一,既要突出特色,又要和谐统一。在这方面,参评年鉴不乏精品设计,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和谐统一,凸显了特色,使人印象深刻。《大理州年鉴 2014》在装帧设计上清新典雅,韵味独具,整体古色古香,富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秦淮年鉴 2013》突出地方文化,彰显地域特色,整体风格定位古朴、典雅。其封面书名、

封底印章、类目标题请当地一流书法家、艺术家创作,使秦淮地域文化的书卷气尽然展现;在全书 24 个类目衬页设计上,以秦淮历史名画为背景,凸显年鉴高雅文化品位;在每页书眉绘上条型长卷的秦淮古画,体现出秦淮风雅之美;以秦淮胜迹图为背景设计封面和封底,再现了昔日秦淮的旖旎风光。

(3)充分发挥图表作用,彰显地方特色。

用好图片和统计表,对于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地州区县年鉴在图片的使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普遍存在表格使用偏少的问题,影响了年鉴的表现力。如果能在图文并茂的同时,增加一些实用性表格,对于增强年鉴的表现力,彰显地方特色和优势,必定会产生深远的意义。如《萧山年鉴 2014》在“地名工作”栏目刊载“2013 年萧山区地名命名更名情况”表,对 2013 年度区域内命名、更名位置的标准名称、类别、拼音名称、位置、申报单位、批准文号、命名还是更名,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在“老龄工作”栏目刊载“萧山区百岁老人名单”,详细记录了截至 2013 年底全区 105 位百岁老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和家庭住址。这些表格都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实用价值。

(4)突出地方特产、旅游景点、风土人情的介绍,彰显地方特色。

地方特产、旅游景点、风土人情都是一个地方的符号、地方的名片,也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充分挖掘和反映这些方面的内容,

对于提升地方知名度,宣传地方特色,弘扬地方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大理州年鉴 2014》在彩页中,刊登了在第六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的大理苍山系列图片和白族传统节日火把节的热闹场景。在“概况”中,以大篇幅设置了“洱海流域保护”和“苍山保护管理”两个栏目,对两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在“农业”中重点记述了“大理州农业十大特色产业”的“薯类”“烟草”“生物药业”以及“特色花卉产业——中国兰花学会国兰种质资源园”等四大产业。在“民族”分目设立了“民族风俗”栏目,对各个民族的不同风俗进行了详细介绍,凸显了地方特色。其他如《萧山年鉴》的【第四届萧山国际旅游节暨 2013 中国国际(萧山)钱江观潮节】、【第十五届萧山杜家杨梅节】、【国家级非遗项目“细十番”首次到台湾演出】、【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建成产出】、【大岩寺重建落成】;《张家港年鉴》的【南丰镇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健康社区】、【常阴沙大米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永联村获中国最美乡村称号】、【“神园葡萄”新品推广项目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重点项目】;《栖霞年鉴》的【“水八鲜”生态观光农业科技园】、【栖霞山风景名胜区】、【幕燕风景名胜区】等条目,都对本区域的特色产业和风景名胜进行了详细介绍。

五、精益求精仍然是年鉴编纂的努力方向

年鉴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年鉴编纂的道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这就要求

我们必须注重细节,精益求精,除了做好框架设计、条目编写等大家比较重视的工作之外,还要在一些我们容易忽视的方面下功夫。

(一)做好配套图表。前面谈到彰显地方特色时,说到了统计表、图片等二次文献对于提高年鉴的表现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文并茂成为当代读者对工具书阅读最基本的期待。所以,配套图表的使用,已经成为年鉴内容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年鉴编纂者的重视和青睐。试想,表格偏少,就意味着读者要从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找出批量列写的指标数据,给读者利用统计指标数据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困难,也不便于读者作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图片偏少,则意味着许多可以通过直观的形象画面获得的信息,却需要通过文字描述,再依赖想象来获得,无疑使年鉴的可读性和使用价值大打折扣。一幅好的图片能起到“一图胜千言”的作用,所以选好图片,对于年鉴编纂非常重要。地州区县年鉴在图片的选择上,必须注意把握以下标准,一是选取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的图片,力求反映新事物、新趋势,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年度特色。图片能够直观地展示一个地方的特色和风貌,年鉴图片、特别是卷首的图片选编得当,对于反映地方大事、新事,凸显地方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选择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图片,最大限度发挥年鉴功能。这是年鉴“接地气”,求生存的明智之举。如果选择的图

●学术交流●

片多是领导视察、开会、剪彩的照片,普罗百姓读者是不会感兴趣的。三是选择更有艺术性的图片,使主题表现得更新颖、更独特、更生动,甚至能达到令读者过目不忘的效果。在实际编辑中,要尽量选择像素高清,构图美观,艺术性比较高的图片。

在配套图表的选用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州区县 2014 卷年鉴有《大理州年鉴》《张家港年鉴》《萧山年鉴》《武进年鉴》《武侯年鉴》等等。

(二)做好装帧设计。装帧设计是年鉴编纂策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年鉴提高综合质量、吸引读者、打造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次评比中,装帧设计占 24 分,其中版式设计占 18 分,装帧印刷占 6 分。装帧设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要考虑装帧设计是鉴赏性和实用性的统一,不仅要表现书籍本身的精神内容,又要符合读者的审美需求。既要追求较大的版面信息容量,又要追求美观大方;既要文字、表格、随文插图等资料形式丰富多彩,又不能背离年鉴简朴、庄重、严谨的主体要求;既要跟上时代审美潮流,还要反对奢华的过度包装。等等。地州区县年鉴在装帧设计上要避免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广告色彩太浓,冲淡了年鉴的主题;二是片面追求美观,忽视了内容表现的协调。封面、扉页、目录、章节页、彩页、正文版面设计,既要美观大方,还要突出特色。特别是正文版面设计应通

过空间的布局,文和图的巧妙搭配达到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在这方面,参评年鉴不乏精品设计,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较好的统一。比如《秦淮年鉴》《武进年鉴》《大理州年鉴》等排名靠前的年鉴。

由于我们版协年鉴工委近年来不断强调反对年鉴的奢华之风,所以,本次评比中未发现过度包装的情况。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三)做好删繁去冗。多年来,年鉴删繁去冗也成为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主要原因是我们很多年鉴字数越编越多,成书越来越厚,而有用的信息却没有成比例地增加多少,既给编辑审阅带来麻烦,也不便于读者携带使用。最主要的问题是,年鉴水分的不断加大,成了读者快速获取所需信息的严重障碍,必须下大力气删繁去冗。从此次年鉴评比来看,多数年鉴都在字数控制上下了一定的功夫,大块头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也有个别年鉴字数过多,有一部县级年鉴达到 195 万字,是很令人惊讶的。如果在编纂过程中不能绷紧瘦身这根弦,那么,年鉴臃肿现象一定还会反弹。

年鉴瘦身的途径有很多,可以从框架结构上优化,可以从题材上删除不符合选取规范的内容,可以在条目编辑上精炼,可以利用图表简化,可以删除空话、套话以及一些赘字冗句,等等。关于年鉴瘦身途径,王守亚副会长在《删繁减雍去奢华》一文中论析颇详,很

有借鉴意义。

各位年鉴界同仁，地州区县年鉴在新时期的发展，有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以后，全国各省市把在地州区县推广年鉴编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收效很大，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如果不能及时地对地州区县年鉴编纂加以引导，必然会导致年鉴编纂的乱象。这些年来，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编发论文、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对年鉴编纂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五年一次的评比活动，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地方综合年鉴。因此，地州区县年鉴编纂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却有不可忽视的后发优势，只要方法正确，措施得力，其优势就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对于做好地州区县年鉴编纂工作，我认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可资借鉴：一是可以借鉴优秀年鉴的编纂经验，拿来为我所用。地州区县年鉴编纂起步晚，是劣势，但却如同“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来一两本最近两届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年鉴，学习他们的做法。二是借鉴近十年来形成的优秀研究成果。许家康会长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是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年鉴理论和编纂实践的著述，对于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年鉴工委主编的《年鉴论坛》《年鉴通讯》以及其他论文集，发表了年鉴同仁大量理

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外，不少省市年鉴编纂单位都编辑了“年鉴编纂指南”之类的小册子，也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综上，借鉴优秀年鉴的成功经验和优秀理论成果，可以使地州区县年鉴在编纂之初，就有比较高的起点，少走弯路。但是，借鉴毕竟是借鉴，绝不是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地州区县必须结合地方实际，灵活调整年鉴框架，编写条目，编纂出既能全面反映地方情况，又能凸显地方特色的精品年鉴。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每五年举办一次评比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学有目标，赶有方向。通过评比，看到别人的经验长处，找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从而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我只是就自己在第五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活动中的认识所及，谈了自己的点滴体会和感想。个别涉及点评地州区县年鉴的地方，难免会有不周全甚至不妥当之处，欢迎各位同仁批评指正。最后，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评奖活动有所学，有所获。借此机会，我衷心祝愿大家在下一届评比中取得优异成绩。谢谢！

参考文献：

- 1、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县级年鉴的体例缺陷及弥补方法》；
- 2、王守亚《删繁就简去奢华》；
- 3、鲍海春《城市年鉴编纂应注重彰显文化特色》；
- 4、莫秀吉《努力增强县级年鉴的实用性》；

洩河的读音

◎ 张可道

从西安西三环南口上西太路，南行十公里处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南郊最大的河流，这就是洩河，当地人读 jiāo(音交)河。因三星项目在此落地，高新区在洩河北岸被拆迁的张王村一带，去年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公园，公园入口处矗立着一块巨石，巨石上刻着“洩河生态公园”，非常醒目，过西太路远远就能看见，原不被人熟知的洩河因此引人注目起来。

相对于著名的长安八水，洩河对很多西安人都有些陌生，洩河的“洩”字怎么读，知道的人不会太多。建设者们很体贴，公园的所有路牌上都标注了汉语拼音，但“洩”字的注音却不是当地人读的 jiāo，而是 xiáo(音淆)。是建设者们搞错了么？查《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没错，都注的 xiáo 音，别无他音。那么，jiāo 河是此地的方言、xiáo 河才是正式的读法吗？

看字典里洩字的释义，音淆的洩河却跟咱们西安音交的洩河没一丁点关系。《现代汉语词典》是“洩河，水名，在河北。”《辞海》《辞源》的解释更具体，说它是海河上游源出河北省获鹿县的一条支流。进一步百度，还发现河北的洩河竟是一条显赫的河流，因为那座世界闻名的赵州桥就横跨其上，多少年来中外游客络绎不绝。总之，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能把发音为“xiáo”的洩河和我们西安的洩河联系起来，如果读成 xiáo 河，人们自然会看成因赵州桥而名的那条河北的洩河。

古语中两水相交谓之洩，西安的洩河，是长安八水中的两条河流——濡(jué,音谿)河和瀉(hào,音浩)河在香积寺交汇后形成的河流，合流后西行数十里，于秦镇附近汇入沣河。遗憾的是当地人对洩河的读音，在官方史志里没能反映出来，长安县志对这些地方色彩独特的字词并没有注音。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陕西师范大学何清谷先生所撰《三辅黄图校释》等涉及古长安地理形胜的文献中，有时写成“洩河”有时写成“交河”，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撰《关中胜迹图》中，大部分写成交河。《三辅黄图》成书于汉魏时期，自此推断，至少从汉魏以来洩河的发音就是交河。查《康熙字典》，则有两种注音，一曰“爻”，二曰“交”。所以，现代字典对洩的注音似应源于河北当地对“爻”的转音，而西安当地人把洩河读作“交”河，则是有根有据的正音。正本清源，西安的洩河，注音应为 jiāo。管理路牌标识的机构，宜尽快地把注音更正过来，以免讹误流传。还有写讲话稿和官方文件的人，也最好能标出读音，不致以讹传讹。

需要说明的是，西安洩河沿岸的人，有的还习惯把洩河称作濡河，因为濡河发源于大峪一带，瀉河发源于石砭峪一带，到香积寺之前，濡河比瀉河要长一些，瀉河依此被当作了濡河的支流，纳入了瀉河的濡河依然是濡河。1997年版的长安县志就把洩河标识为濡河，但补充说：“濡河在香积寺与瀉河合流后又称洩

编者按：在抗日战争中，以中条山战役为代表，陕西籍的将士们书写了一曲又一曲大义凛然的“大秦之声。”陕西作家陈忠实曾这样评论道：“这些关中将士无论性格性情具备什么样儿的地域性特质，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血战中体现出来的凛然不可侵侮的大义，正是中华民族辉煌千古存立不灭的主体精神。”这其中有许多西安籍的，往期《西安地方志》中介绍过赵寿山、许权中、张灵甫等人。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从本期开始，我们再介绍几位西安籍的著名抗日将领。

著名抗日将领——孙蔚如

孙蔚如(1896—1979)，名树棠，字蔚如，1896年1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咸宁县豁口村(今属西安市灞桥区)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学生时代就博览新书，投身民主革命。1910年入咸长初等实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1911年10月20日，陕西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孙蔚如曾协同革命士兵进攻西安城内旗兵。1913年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课员。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举起护法旗帜，陕西革命党人起义响应，组织陕西靖国

军。孙蔚如立即投笔从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队第1营任连长，参加了配合南方的护法战争。在反击北洋军阀八省军队的围攻战役中，他率领四排兵力，以少胜多，重创甘军陆洪涛部喻升一标(相当一团)。

1922年转入杨虎城部任第5营营附，旋任营长。杨、孙二人遂义结金兰，誓同患难。孙



(上接第16页)河”。一个高等院校的学生，既可以称为学生，也可以称为大学生，但大学生的称谓当更确切些。相似的道理，从香积寺到秦镇这一段湑漓合二为一的河流，称作泾河更为妥帖。

地名中潜藏着独特的历史基因，蕴藉着

人们无法替代的情感体验，正确地书写和注音，是对传统的珍爱，也是对一方水土的敬意，更是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讲的看得见的乡愁，也包括着亲如故乡称谓重如祖宗牌位的山川河流的名称吧。

●人物春秋●

初入杨部，即参加了在乾县铁佛寺伏击甘军陆洪涛部的战斗，获步枪千余支，子弹 60 余万发，军声大振。随后，在马嵬、武功附近，与直系军阀激战二十余日，立下战功，因两臂负伤而留医凤翔。

杨虎城部因军阀部队大举来攻，形势严峻。杨虎城与于右任商议后决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右任“南下请示孙中山”，杨虎城“率队北赴沙陀国（指陕北）”，暂依地方实力派人物井岳秀，整训休养。

孙蔚如未及伤愈，即东出潼关，经河南，拜谒岳武穆庙。樊钟秀约他南下广东革命，他表示，由于与虎城的友谊，且北方革命力量只留此一根蒂，愿在北方与杨一起革命。随后他赴北平，再行治伤手术，于 1923 年初到陕北会合杨部。

杨部到达陕北后，缩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驻防靖、安、定三边地区。因杨虎城养病榆林，由李子高任团长。李为人忠厚而才疏，应付局面颇感力绌。孙蔚如回来后，受命为中校团附，着手训练部伍，提高士气；剿灭土匪，以利商贾；铲除盐政积弊，便利人民吃盐；开办小学五所，提高汉蒙人民文化水平；开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干部。教导队于 1923 年春开办，着重招收各地进步青年学生，并聘请赵寿山、刘光甫、段象武等受过正规军校训练的人作教官，培养忠于三民主义的军事干部，孙自兼队长。吴岱峰、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都是当时招考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以后成了杨虎城部队的骨干力量。杨虎城军中一向有“测、保、教”是骨干的说法，即指

其军官中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安边教导队出身的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安边教导队的开办，形成了杨部“自力更生”培训军官的传统。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杨虎城起而响应，部队改编为陕北国民军，杨为总指挥，孙为参谋长，并兼教导营（由教导队扩编而成）营长、第 2 游击支队司令。是年冬，杨部挥师南下，又改编为国民军第 3 军（军长孙岳）第 3 师，杨任师长，孙任参谋长，对北洋军阀作战。

1925 年春，国民军向大荔、朝邑、郃阳、澄城、韩城一带的刘镇华镇嵩军的帮凶麻振武部发起攻击，收复郃阳、韩城两县，配合了国民第 2 军在豫西击溃刘镇华军的斗争。是年夏，在千阳、陇县地区接连击败北洋系甘军孔繁锦部；为接应国民军第 3 军入陕，参加追击北洋系陕西督军吴新田，在凤翔重创吴部第 7 师。

1926 年春，吴佩孚北连奉张夹击国民军，国民军第 2 军在河南失败，吴佩孚又指使河南刘镇华、陕西吴新田、甘肃孔繁锦三支军阀部队号称“十万之众”，欲一举攻占长安。北方革命形势顿形紧张。陕军联合御敌，以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部共同坚守西安。

坚守西安之役自 4 月开始。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部队坚守城池，孙部守东北城隅，为最接近敌军之处，是敌军攻城之重点。围城期间，大小战斗，日辄数起。围城后期，斗争更为艰苦，军民几乎断炊，以油渣、谷糠、榆树皮为食，渐亦不继，每日饿毙者数十人以至数百

人。在这种情况下,孙部仍然坚守阵地。就这样,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西安达 8 个多月,直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 11 月来援,才解围。是役,世称“二虎(杨虎城、李虎臣)守长安”,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战役之一,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北伐战争。

1927 年春,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 集团军第 10 军,孙蔚如任军参谋长,后调任第 2 师副师长代理师长,部队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5 月,第 10 军在归德协同友军与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部展开豫东会战。孙在程大庄一役,仅以步兵 1 营和师部手枪连抗击了步、骑、炮联合进攻的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中,他三面被敌包围,仍坚守不退,沉着应战,予敌以大量杀伤,牵制了敌人,为总部争得了时间。豫东会战,杨虎城部损伤很大,在归德孤立无援,乃脱离战场,移防皖北太和、河南鹿邑一带整训。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第 38 军(由原杨虎城的 17 路军缩编)军长的孙蔚如派出第 17 师(师长赵寿山)、第 177 师之 529 旅(旅长许权中)、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次第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以重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寇的军事进展。

娘子关战役和忻口战役后,孙部前方军队西撤黄河沿岸休整。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率领慰问团前往慰问,并对孙部班长以上干部多次讲解抗战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等人还亲切接见了赵寿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孙部提出了“三大禁

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和“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

1938 年 2 月,第 17 师和第 529 旅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属太行山东路军战斗序列,归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在与八路军合作中,建立了内部政治工作,还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改善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6 月,配合八路军,收复了上党地区 19 个县。7 月,孙部改编为第 31 军团,辖第 38 军和第 96 军两个军及军团部直辖的教导、骑兵两个团。孙蔚如解去省主席职务,任军团长,率在陕各部由大庆关东渡黄河对日作战。永济战役后,留一旅在永济、虞乡一带以运动战担负守卫任务,主力在解县、运城、安邑、夏县一带守卫中条山西段。孙部防地横跨三百余里,纵深三四十里,为华北地区守卫黄河、阻敌南犯西侵的重要战场之一。11 月,孙部又改编为第 4 集团军,孙任总司令,所辖部队除原有两军外,又辖川军李家钰之第 47 军。

1939 年 6 月 6 日,日军牛岛第 20 师团、川岸第 37 师团之一个旅团,配属野炮第 26 联队、山炮第一联队、空军山口集成飞行队(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共 38 架),分九路进犯平陆、茅津、大巨 20 里岭防地。

孙蔚如主动将部队后撤平陆,敌跟踪进逼,将孙部主力包围于平陆北岸。孙后撤已毕后,即令第 96 军军长李兴忠率陈式玉之第 177 师、孔从周之独立第 46 旅,由敌正面突入,歼敌步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经过十昼夜激战,歼敌逾万(日军在运城追悼士官以上

●人物春秋●

阵亡者,所列骨灰罐即达 1700 余个),完全恢复原有阵地,打破了日军扫荡中条山之企图。孙部也伤亡 5000 余人。

1940 年 8 月,为策应八路军“百团大战”,派出部队在同蒲铁路南段沿线,深入敌后分散游击,破坏铁路、公路,使敌交通干线不能正常运行。这种与八路军相似的游击战法,有力地策应了“百团大战”。

孙蔚如率部防守中条山两年多,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先后 11 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大量杀伤了敌人。日军牛岛之第 20 师团在中条山与孙部对战,曾先后补充新兵 19 次。日军称中条山为其华北战场上的“盲肠炎”,国人则把第 4 集团军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1940 年 11 月,第四集团军调防河南,守备黄河以南之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在次年 10 月广武地区战役中,配合其他部队收复郑州。

1944 年 3 月,在豫西战役中,孙蔚如部第 4 集团军在虎牢关激战 7 日夜,杀伤日军数千人,坚守阵地两周之久。敌军不能越雷池一步,乃转而以主力进攻汤恩伯阵地。6 月,孙蔚如以战功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第 4 集团军总司令。

1945 年 6 月,孙蔚如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实际上失去了对第 4 集团军的指挥权。

由于战功卓著,曾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孙受任武汉战区受降主官,19 天共解除日军武装 21 万人,

接收工厂、仓库等三百余所,编遣伪军叶蓬部邹平凡、李宝莲、公秉藩等 3 个军 9 万余人。

1946 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旋改行辕,以程潜为主任,孙为副主任,完全成为有职无权的备员。

1948 年,武汉行辕撤销,孙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此间,孙蔚如始终记挂着狱中的杨虎城,他两次向蒋介石请命释放杨,列举种种理由,甚至表示,他愿意作人质代坐牢,但均被拒绝。同时又通过各种关系,与人联名上书请求,并托人四处打探,均无结果。

1949 年初,他留在上海,未随国民政府赴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50 年 8 月,孙蔚如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历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委、陕西省第一、四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副省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9 年 7 月 27 日,孙蔚如因病逝世,骨灰安放在西安革命公墓。



先秦考察官吏期限三年

政兴在得人,政弊在失人,官吏道德修养的高低、个人素质的好坏是政治是否清明、吏治是否清廉的关键。所以先秦时期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和任用十分重视,目的是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吏,以保证吏治廉洁高效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德才选人任官的制度和官吏管理制度。

夏商时期,实行三宅三俊法选任官吏。周公执政期间,特别强调夏、商两代任人以贤的历史经验。及至成汤登上了王位,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选拔人才,结果证明那些获得信用的贤人,的确有德才而不徒具虚名。夏、商时期把政务好坏、治国理民方式和执法是否公允作为选用官吏的标准。

周代在夏、商三宅三俊法的基础上,推行六德、六行、六艺选官法。《仪礼·乡饮酒礼第四》郑玄注云:“六德:智、仁、圣、义、中、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凡登六德、六行、六艺者,在三年大比时推选出来,作为贤者能者荐之于王,授官分职,“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周礼·地官·乡大夫》)。

周代按六德、六行、六艺选人任官是按照特定程序逐级进行的,选人任官要经过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四个阶段逐级选拔,最后经过司马论定后才可为官。司马考察的重点是

被选对象的德行、学识和语言,三者均优者才能入官。这四个阶段一般经过三年才能完成。周代的这种选人任官的选举制度才德并重,选拔程序有条不紊,并且注重被选者的学识,这为后代选官制度确立了基本路径和标准。

秦律规定了保任连坐制度,要求担任官吏者必须有保举人,保举人还必须对被保举人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即“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列传》)。这种保任连坐制度有效地防止了选官举人过程中徇私舞弊行为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殷商时期鉴于贪赃的危害,明确表示不任用贪官。商朝初建,继承古代“鞭作官刑”,制定《官刑》。制定《官刑》的目的是让百官忠于职守,如果胆敢“殉于货色、恒于游畋”,轻则丢官,重则危害家庭。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则是先秦时期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官吏提出的职业要求。它提出了各级官吏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规范和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如“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别,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决。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为吏之道》对各级官僚的从政作风提出了要求,也规定了官吏应该具备的品格,构成

●史料钩沉●

了秦选拔、任命以及考察官吏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标准尺度。

中国历史上对官吏的考绩制度起源很早,文献多有记载,战国时期又建立了比较明确的年终考核制,史称“上计”制度,这是定期(每年)通过检查官吏的政绩以作为升贬依据的一项措施。“计”,就是“计书”,指统计的簿册。上计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仓库存粮数字,垦田和赋税数目,户口统计,以及治安情况等。《商君书·去强篇》说:“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这个十三数,就是“上计”所要统计的类别。

每年,地方官长都必须把一年各种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去,国君把“券”剖分为两个部分,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便可操右券来责成臣下。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上计”时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果考核的结果成绩不佳,便可当场免职。高级官吏对于下级官吏的考核,也采取同样的办法。

秦汉的上计考核及上计贡士制度,战国已经开其端。对官吏的定期考核,有三种较明显的作用:一是对官吏有一种心理威慑,使其不敢为非;二是对官吏行使权力有一定的约束;三是对官吏施政有较明确的目标要求,促使他们勤政廉政。

·名句欣赏·

【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自环:自营,即为自己打算。背:违背。

【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管子·形势》

无乡:乡,方向;没有固定的方向,对谁都无偏无私。怨怒不及:不会遭到怨恨。

【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甘露时雨,不私一物】——《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私:偏爱。

【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淮南子·修务训》

齐:一致赞同。



古代御史如何反腐

据考证，以御史弹劾为核心的监察制度创立于秦，秦和西汉的中央监察机关称御史大夫府，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虽为副丞相，但并不受丞相领导，而是与丞相和太尉同位三公，分别受皇帝领导。西汉末到东汉，御史府演变为御史台，放在皇室的亲信机构少府，与尚书台、谒者台合称“三台”，御史中丞作为台主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号称“三独坐”，具有独特的地位。至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成为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历代承袭而不改。

为何帝国要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呢？因为各级官员是皇帝请来的“打工仔”，“老板”怕打工的偷懒怠工、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挖帝国公司的墙脚，导致帝国大厦倾覆，所以找一

些监工来监督他们，使其尽忠尽职尽责，不敢贪腐。御史既是监工，当然不能由被监督者推选任免，而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免，其他部门想插手基本上不行。

皇帝的监工是“朝廷耳目”，故要格外精挑细选。比如唐代要求：“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宋代要求：“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明治体之人，以革浇薄之弊。”明代要求，“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可见，从选人开始，就注重正人先正己，以树立御史的权威。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御史由皇帝任免，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同级、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甚至不受御史台长官左右。御史出巡回京，“或露章面核，或封章奏核”，直

●史料钩沉●

接向皇帝汇报,无须经台主转呈,哪怕台主转呈也不能拆阅。同时,皇帝还赋予御史“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尚方宝剑。在特殊情况下,御史可以“便宜从事”,先斩后奏。

为了避免御史行使职权受干扰,在组织编制和地位上,御史台与行政、司法、军事等部门平行而立,不受其他部门管辖,完全独立,自成体系。比如唐代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监察,各负其责。

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是如此,由中央派出御史(不同朝代称谓时有不同)到地方,设立派出机构,垂直管理。比如汉代的十三刺史,是中央派出官员,设立州衙门,不受地方管辖节制,刺史的官秩只有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却敢以贱察贵,监督二千石的郡守,刺史“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御史监督别人,谁来监督御史呢?御史也是人,还是有特权的人,御史不受监督同样会腐败。御史对皇帝负责,皇帝显然可以监督御史,可皇帝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监督得过来。所以皇帝想出了用监工来监督监工的办法,比如汉武帝设立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司隶校尉是皇帝特设的独立监察机关,负责监督京畿地区百官,理当包括御史台的官员;丞相司直监察政府行政官吏,无论中央地方,都可以监督;而这两个机构又都受御史台的监督,于是形成了三者互相独立,各成体系,又互相

弹奏的异体监督格局。

又比如宋神宗在尚书省设都司御史房,是一个专掌弹劾御史失职之事的监察部门,其劾举御史失职之事,作为皇帝黜陟御史的依据。通过这个机构,行政部门可以纠察御史的失职行为,制约其滥用职权。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御史对整饬吏治,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皇权政治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御史扳倒贪官的事例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

严嵩是明代权臣,从嘉靖二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42—1562),盘踞津要,“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严嵩传》)。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从嘉靖十六年(1537)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上负国恩,下乘輿望”;嘉靖十九年(1540),御史谢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前面共有十位御史或给事中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对此,连修《明史》的人都不得不说:“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

后来,严嵩与徐阶互斗,严嵩斗不过徐阶,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将严嵩冷落一边,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误国,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以“纵爱逆子,

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令其回乡。

最后，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说他勾结倭寇、图谋造反，明世宗震怒，将严世蕃处斩，严嵩削职为民，所有家产被抄没——一代权臣终被扳倒。

虽说古代帝王为了监督百官，想尽了监察的办法，尤其是明代监察“组织之密、取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但从十多位御史艰难扳倒严嵩的史实仍可看出：

首先，御史是靠不住的，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气不衰”，仍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败边升官，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二十年，成为“不倒翁”。可见，监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铁者自身过不过硬，有没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为关键。

所谓“主圣臣直”，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的皇帝，把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第二，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受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

是严嵩的打手。只不过，严嵩收买笼络御史，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严嵩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本。

第三，对那些无法操纵御史的官员来说，御史是得罪不起的，其举可以让自己升官发财，其劾则让自己受处分甚至性命不保，“一言以定兴废”。为了不让御史弹劾自己，官员难免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有的御史也是来者不拒，互取所需，猫鼠一家亲。于是御史出巡，表面上看是“代天子巡狩”，实则是一路揽财。

虞云国先生在《晚明的贪腐：体制性的不治之症》一文中举了诸多明代御史贪墨的例子。一者，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丢失四件行李，为地方官查获，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受贿簿，记载受贿“不下数万”。二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过衡山县，知县陈安志不满他托大无礼，一怒之下打开其行篋，暴露“金银诸物甚夥”。事情闹上朝廷，黄廷聘受了“冠带闲住”的处分。

对御史出巡中的丑行，清代伍廷芳曾有痛切陈议：“既需给以盘川，又累地方之供应。所带不法人役，时或狐假虎威，苛索抽丰，沿途骚扰，是为耗费病民之一害。”本来是用御史反腐的，结果御史本身成为腐败重灾区，当纠肃贪贿的御史成了贪腐的急先锋时，就不是哪一个、哪一部官员贪腐的问题了，而是体制性的贪腐。而连打铁者自己也腐化了，哪里还有干净的呢？故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百团大战 之五大谜团



“百团大战纪念碑”矗立在阳泉市区南6公里,海拔1160米的狮脑山主峰上。

在抗日战争中,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百团大战,影响巨大。时至今日,百团大战依然给研究者留下了不少难以解开的谜。

谜之一:八路军为什么会进行大兵团作战

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一直以小规模游击战著称。为什么到1940年八路军会发动大兵团作战的百团大战呢?

首先,是为了遏制险恶的妥协投降与分裂逆流。

1940年,日本急于将侵华战争告一阶段,以集结更多的兵力南下,夺取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殖民地。为此,日军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拉拢蒋介石、汪精卫政权。一方面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紧与蒋介石政权“和谈”;另一方面在桂南、粤北、河套、鄂北、鄂西发动新的攻势,对重庆进行持续半年多的大轰炸,并扬言要攻打重庆、昆明、西安……

中共极其担忧蒋、汪“统一投降、统一反

共(毛泽东1940年7月6日语)”、“中日联合‘剿共’(毛泽东1940年11月9日语)”,希望通过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蒋介石政权投降的可能性。

其次,是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至1940年夏,日军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因此,刘伯承把日军的上述部署称之为“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

由于日军的据点相互呼应,要打破这种“囚笼政策”,就不能只在部分地区发起攻击,而必须在比较广阔的地区同时发起攻击。

再次,八路军的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部公开宣布:

抗战以来，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由3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创造了包括将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八路军总部还于1940年7月7日公布：3年来八路军收复县城150座，毙、伤、俘敌伪40万人。抗击的日军达40万，占侵华日军总人数的58%，并抗击了全部伪军。

八路军的实力还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中得到了体现。1939年冬季和1940年春，八路军对顽固派的进攻进行了自卫反击，阎锡山的晋军因此而遭受重创，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基本被歼灭，石友三的第六十九军大部被歼。彭德怀认为，“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

谜之二：为什么没有中央军委的批示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下发给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

那么，为什么又未见中央军委的批示呢？

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

具体到百团大战，聂荣臻说：“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

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彭、左7月22日下达的《战役预备命令》已经是“命令”，表明当时并没有必须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后才能组织这种战役的程序。

必须指出的还有，百团大战在当时是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肯定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于1940年9月10日发布《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华北“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山东和华中地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1940年9月18日和9月20日，延安各界连续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隆重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在9月18日的集会上发表了《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的讲话，毛泽东出席了9月20日的集会。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延安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谜之三：为什么正太战役会扩大成为百团大战

从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到最后下达行动命令，八路军总部部署的都是20来个团参加的正太战役。直到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首次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彭德怀、

●史料钩沉●

左权才意外地发现共有 105 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于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光辉的名词——“百团大战”。

为什么正太战役会扩大成为百团大战?

首先,是因为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

根据“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不但八路军总部只部署了 20 来个团参战,各集团同样也只具体部署了部分部队参战。因此,“百团大战”实际上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一级机构发动的,而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积极主动参战的结果。

百团大战还有人数与八路军正规部队相当或更多的游击队和民兵参加,并有至少 20 万民众参加,这更是根据地军民积极参战的结果。山西阳泉的老民兵王德顺说:“我们实在是受够了汉奸和小日本的气了!听说正规部队要打日本人,能拿起武器的人全跟着部队跑。”

这样的百团大战,实际上较之八路军总部或其他统帅部正式部署的百团大战更为宝贵,更为伟大,是最值得中华民族弘扬的民族精神。

其次,是由破袭正太铁路的目标所决定的。

正太铁路,以河北石家庄为起点,山西太原为终点,连接平汉、同蒲二路,全长 243 公里,其中在山西境内 170.7 公里。百团大战爆发时,沿线驻有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驻阳泉)为主的日军共 3600 余人。但在百团大战爆发当晚,正好有 1200 名退伍日军在回国途中到达正太路,其中,400 人进入阳泉,800 人进入娘子关。

显而易见,要对正太路进行比较大的破坏,就必须割断正太路日军与其他地区日军的联系。因此,105 个团参战虽出乎意料,但参战部队数倍于主战场上的 20 来个团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大破袭带来大战机,促进了更多的部队参战。

8 月 20 日 22 时,八路军在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同时发起攻击,战区内日军一片混乱,很多日军长期高枕无忧的目标成为八路军的攻击对象。

号称“天下第九关”的三晋门户娘子关,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经为日军师团司令部驻地。由于长期未受攻击,1940 年,这里只驻有一个中队级的守备队。在百团大战中,娘子关成为八路军首轮攻击的主要目标。8 月 21 日中午,八路军将士骄傲地把中国国旗插到了娘子关上。这一图片与消息在各报刊出,全国军民大受鼓舞。

正太路日军指挥中心阳泉也受到干扰性的袭击,八路军袭击部队占据距日军旅团司令部仅 300 米远的庙高地,而且据守达四日之久。遗憾的是,装备太差的八路军只能用步枪向阳泉城射击,对城内日军形不成真正的威胁。

在正太路外围,由于平汉路、同蒲路及铁路沿线主要公路也同时受到攻击,在 8 月 28 日前,日军一直没能派出部队前来增援正太路。

在这种背景下,战区内那些小据点、铁路、公路、桥梁、电线杆,绝大多数成为八路

军、游击队和群众进行破袭的对象，参战部队因此也就越来越多。

谜团四：百团大战的时间为什么一再延长

八路军总部对于百团大战最初并没有规定战期，只是在预备命令中要求从部队出动之日起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这大体可理解为作战一周左右。因此，一二九师8月17日下达的作战指示要求：“必须保证从廿日廿二时开始连续破击至少五天或七天，并争取更长时间才能达到摧毁任务。”

那么，百团大战为什么又打了这么久呢？

首先，是的大好战机延长了作战时间。

战斗打响后的几天内，战区内日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八路军完全控制了战场上的局势。为了争取更大的战果，8月24日，“集总令正太破击必须坚持至少半个月（15天）之久”。

8月26日，八路军放弃苦守了七天七夜的狮脑山。阳泉日军开始出击。

8月28日，八路军放弃了对娘子关的争夺。河北日军开始进入山西。

8月30日，日军开始实施“晋中作战”，来自晋南的6000多名日军以500人左右为一路，阻击从正太路返回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一度威胁到转移至卷峪沟的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局势开始紧张起来。

根据敌情变化，八路军总部于9月2日下令自次日起全线转移，各种战斗于9月10日全部结束。

其二，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发动了第二

阶段的战斗。

百团大战前期的胜利，使彭德怀产生了开展第二阶段战斗的想法。他于8月31日向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征求意见，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询问是否可以彻底摧毁正太路 and 同蒲路部分路段，使晋西北、晋察冀、太行山三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但扩大战果是完全可能的。1940年9月16日，朱、彭、左联名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这一命令要求：一、继续破坏敌寇交通；二、克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

9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

其三，反“扫荡”和扩大政治影响使百团大战延长至1941年1月下旬才最后结束。

为了对百团大战实施报复，日军于1940年9月底部署了一场“毁灭战”。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多达5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实际出动兵力约15万。

在这种背景下，百团大战转入反“扫荡”阶段。

10月28日，日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在一度窜入关家垴，这个地方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砖壁村仅十多里山路。此时，陈赓所率的七十二、一十六、三十八、二十五共4个团正在八路军总部附近地区休整。冈崎大队一到关家垴，便被八路军包围起来了。

关家垴战斗于10月30日凌晨4时打响，时在前线的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说：“经两昼夜的激战，发动了十七八次猛烈攻

●史料钩沉●

击,多次进行白刃格斗,终于将敌占山头周围有工事的高地完全占领。冈崎大队六百余人几乎全部被歼灭,仅在关家垴的山上,敌人留下的尸体就有二百八十具,还有尸灰三大堆。可见敌人败得多么惨重。”

八路军的伤亡情况也很严重,连同阻击部队在内,共伤亡 600 余人,关家垴战斗因此而成为百团大战受到批评最多的一次战斗。

不容忽视的是,日军更加承受不了一次战斗死亡数百人的损失,关家垴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 11 月 2 日,华北方面军匆匆宣布结束全面“扫荡”,关家垴战斗因此而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12 月 10 日,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事实上宣告了百团大战的结束。由于战绩统计截止日期为 12 月 5 日,因此,史学界不少人以 12 月 5 日为百团大战结束的标志。

此后,一方面,各根据地的反“扫荡”战斗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国共关系特别紧张,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于是,八路军各部一方面继续反“扫荡”,另一方面抓住机会继续打破袭战和伏击战,直至 1941 年 1 月 24 日晋西北根据地粉碎日军的反“扫荡”,百团大战才最后结束。

谜之五：百团大战在历史上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多的批评和非议

百团大战在进行期间,获得了全国抗日战线的一致高度评价,“后方的同胞们为此感奋到流泪”(1940 年 9 月 19 日《新华日报》社

论援引重庆某晚报语),也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好评。但让人们感到十分困惑的是,这一伟大的爱国壮举,在历史上却饱蒙冤屈。

首先应当指出,像任何一场战役一样,百团大战也存在着不少主观设想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失误,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对这些失误和错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加以指出,是很有必要的。在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八路军总部和各作战部队就不断地做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在实际战斗中不断地调整不恰当的计划与要求。

其次,由于日军的疯狂报复,百团大战的确加剧了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这种困难的程度,令人很难想像。如 1943 年 3 月,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在这种背景下,对百团大战出现一些情绪化的批评意见,也可以理解。

最为根本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时出现将某个观点绝对化的错误思想倾向。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下,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式似乎只有一种,就是那种“扑一下就跑”的游击战,百团大战因而成为一个严重“错误”。再加上 1959 年以来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文革”期间对老师、老将的错误批判,百团大战这一抗日壮举更加被扭曲得不堪回首。

历史不可能永远被扭曲,今天的中国人又像百团大战期间的中国人那样,对百团大战及其领导者、指挥者、参战者和支持者充满敬意。百团大战所产生的良好政治影响,无可替代,弥久愈珍。



中国解放区军民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了日本朝野，显示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与此同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8月8日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进攻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金日成率领的长期战斗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抗日部队也转入反攻作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中，对日

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解放区军民来承担的。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告：“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月10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军队，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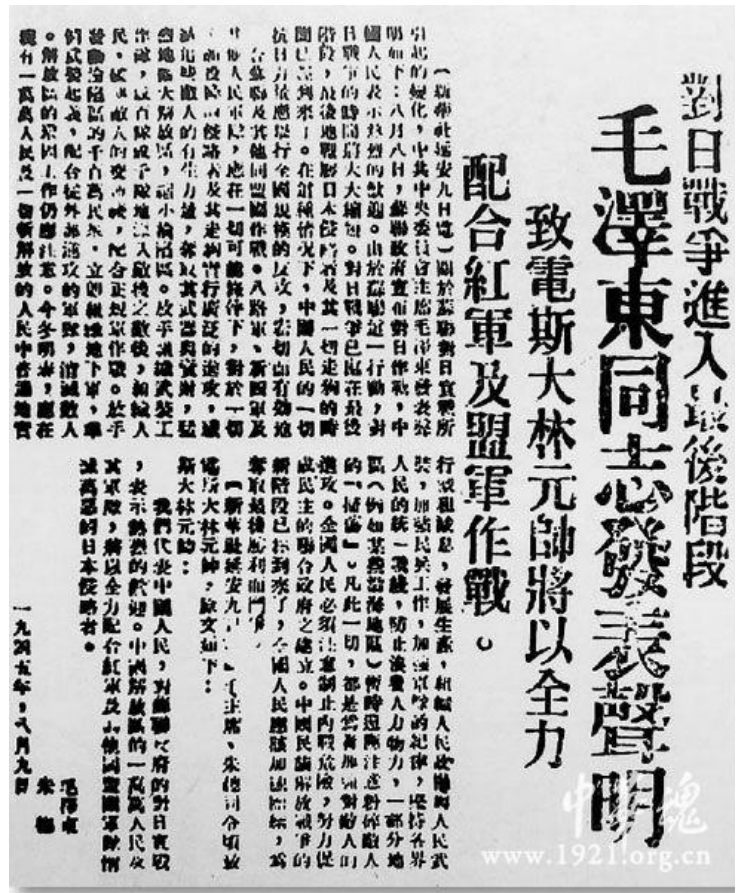
●史料钩沉●

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

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要他指挥美军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连同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投降的日本军队统统只转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关于日军受降的第一号命令,要求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缴械。

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三是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与此同时,美国则用各种方法紧急把国民党军队运往被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包围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

8月13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准解放区部队接受日、伪投降的错误命令。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被



国民党军队包围之日军在外)。同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军队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东江、琼崖、雷州半岛等各抗日前线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对拒降的日、伪军则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晋察冀军区对拒降的日军及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一部配合晋绥解放区的部队进攻太原;一

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

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先后攻克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

晋冀鲁豫军区的太行部队向新乡、博爱、太原等地进攻；太岳部队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的日、伪军进攻，以策应晋绥军区部队进攻太原，同时切断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铁路交通；冀鲁豫部队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并配合山东解放区的部队进攻济南。冀南部队首先对运河以东的伪军展开进攻，接着攻击临清城，突入城内，并截歼逃敌大部。

山东军区组成山东野战兵团，以五路大军向津浦路山东沿线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地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鲁中部队向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沿线进攻；滨海部队分别配合胶东部队和新四军进攻青岛、新浦（今属连云港市）；胶东部队向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进攻；渤海部队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沿线进攻；鲁南部队向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进攻。

在华中，新四军苏浙、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及鄂豫皖湘赣、河南等各军区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

州、汕头、海口等城市。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进军。东北抗日联军在中苏边界营地召开反攻誓师大会后，回国配合苏联军队作战，并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等人民武装力量会合，占领战略要地，解放了东北一批城市和乡村。

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侵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对中国解放区的抵抗作战。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仍在坚决、猛烈地继续。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对日军全面大反攻的作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但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围的一些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西安城门趣闻(十)——朝阳门

(西安城东面偏北门之一,位于东五路东口)

1. 朝阳门位于唐大宁坊

今朝阳门位置,在原隋唐长安外郭城大宁坊西街处。大宁坊为隋唐长安外郭城坊里之一,位于朱雀街东第四街(皇城东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二坊,在郭城的东北隅。南北长588米,东西宽955.5米,形制为横长方形。周筑坊墙,四面各开一坊门,中有通四坊门的十字大街。东南隅有神龙元年(705)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祈福所立的罔极寺。西南隅有天宝元年(742)所立太清宫。此坊因靠近三大内,因而官僚贵族第宅密集,栋宇相接。唐末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此坊被隔于新城东墙之外,历五代宋金元时期。明初拓筑西安东城墙至今址后,此坊西半部包入城内,解放后适应交通的需要,开辟此门,门址在原大宁坊西街中段处。

2. 朝阳门内唐太清宫

今朝阳门内南侧,唐代时有一座著名的道观太清宫。这座道观的设立,有着一个神话故事。天宝元年(742)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

秀上言玄宗皇帝说:“玄元皇帝(指道教始祖老子。李唐以老子李耳为始祖,唐高宗上老子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降,见于长安丹凤门之通衢,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皇帝,并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玄宗听言大喜,始祖显灵,以为神佑,于是遣使臣往桃林县函谷关尹喜台西,果然得到老子所赐灵符,由此玄宗令在长安大宁坊西南隅今朝阳门内南侧建玄元皇帝庙。同年九月,改庙名为太上玄元皇帝宫。次年正月,加号“大圣祖”,三月,改名太清宫。

太清宫内,以太白山白石雕塑老子像,又采白石为玄宗等李唐帝王像,侍立于老子像侧。宫垣之内,连接松竹,以像仙居。宫内有圣祖殿、御斋院、公卿斋院等,圣祖殿有名画家吴道子所画老子像。宫的正门称琼华门,东门称九灵门,西门称三清门。德宗贞元十三年(797),由东面永亮坊西北支分龙首渠水,流至大宁坊西南隅太清宫前汇为池。宫址约在今西安城内朝阳门内南侧东四路东段。



西安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兴教寺塔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原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文化遗产申请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名单中确定中国有22处遗产点、哈萨克斯坦有8处遗产点、吉尔吉斯斯坦有3处遗产点。

中国公布的22处丝绸之路遗产点包括:河南省4处、陕西省7处、甘肃省5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西安市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在列。

兴教寺塔的主体是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墓塔,另有陪葬于玄奘塔侧的有其两大弟子窥基和圆测的墓塔。

玄奘(600~664)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学家,卒后初葬于长安浐河东岸的白鹿原上,唐高宗总章二年(669)迁葬现址。唐总章三年(670)建寺,肃宗赐塔额曰“兴教”,全称“大唐护国兴教寺”,冠樊川八大寺(兴教寺、观音寺、兴国寺、洪福寺、

华严寺、禅经寺、牛头寺和法幢寺)之首。大和二年(828)重修,历代屡屡重建、修葺,清同治年间寺殿毁于兵火,唯3座灵塔幸存,是中国重要的佛教史迹。

民国11年(1922)再度重修。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座砖塔在今寺西部“慈恩塔院”内,品字形参差排列。中间最高的一座是玄奘墓塔。塔平面方形,作楼阁式,共5层,高23米,底边长5米。塔身壁面仿木结构,用砖砌出八角形倚柱、额枋和斗拱。斗拱之上砌两层菱角牙子再叠涩出檐。挑檐大砖层多,在其他唐塔中少见。每层分作3间,次层以上塔心实砌。塔的正面有券门,龕内置玄奘塑像1座。塔背嵌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所立“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刻石,记述玄奘生平。塔为早期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的典型代表作。玄奘塔的左右各有形式略同但规模较小的砖塔一座,均为3层,高约7米,底层边长2米,系玄奘两大弟子窥基和圆测的灵塔。窥基塔创建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大和三年(829)重建,背面嵌有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所立“大慈恩寺法师基公塔铭”刻石。圆测塔则是宋政和五年(1115)自终南山丰德寺迁葬圆测至此时修建的,塔背面嵌有民国(约1930)重摹宋政和五年“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刻石。

五一村(五一社区)



1997 年的五一村。

地处古城西安西门外和玉祥门外的环城西路沿线,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改社区前,由马家庄、杨家围墙、梁家庄和新郭家口等组成,分为七个村民小组。2012年,总面积 258.5 亩,595 户,1619 人,其中有 533 名居民分布在 16 家集体企业中工作。

大多数村民是由明代中期开始,世世代代繁衍过来,也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是由河南、山西、山东逃荒要饭过来的。姓氏达 20 多个,主要大姓马家庄有:薛、解、齐、何、赵、智等,杨家围墙有:倪、叶、李、金、王、贺等,梁家庄有:梁、何、李、杨、顾等,太和庄有:王、冯、周、孙、何等,新郭家口有:吴、李、邓、郭等。

五一村人口繁衍增长经历了明、清、中华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在长达 600 年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灾害,疾病流行,兵荒马乱,造成人们迁徙、流离、背井离乡,生活极不稳定。人口出生率高成活率低,

人口繁衍增长缓慢,特别是遭遇大灾大难,人口呈下降趋势。1949 年刚解放时,全村(马家庄、太和庄、杨家围墙)有村民 120 多户,600 多人。新中国成立后,村民生活稳步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迅速增长,家族分户独居增长加快。1956 年,全村有 149 户,834 人;梁家庄、新郭家口迁入后到 1959 年有 208 户,1007 人;1963 年有 174 户,899 人;1973 年有 270 户,1100 人。1977 年之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改变陈旧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生育观,积极采取节制生育、优生优育措施,人口猛增的势头得到遏制,出生率降低,人口素质提高。

唐代,外廓城诸坊在今莲湖区域内的有颁政坊(今大庆路与西关正街之间)等 16 坊,五一村位于颁政坊。清代,在红庙坡置红庙廡,辖 41 村。五一村的组成部分马家庄、太和庄、梁家庄、杨家围墙属红庙廡。民国 34 年(1945)

11月,基层撤镇设区,五一村归十二区。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第十二区成立阿房区人民政府,五一村归阿房区潘家村乡管辖。1954年5月1日,由马家庄和孤魂坛两个自然村组成合作社,“五一蔬菜生产合作社”成立。“五一村”由此得名。1955年11月,马家庄社和团结社合并为五一高级蔬菜生产合作社,下设四个生产社和一个试验站,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归属阿房区潘家村乡管辖。1958年8月,潘家村乡成立潘家村人民公社,郭家口、梁家庄和红星社以及仅剩下的3户单干农民都并入五一高级农业合作社,组成五一生产大队,归潘家村公社。1958年10月,土门人民公社成立,下设派出机构“五一管区”辖五一、光明、任家庄三个大队。1960年5月,莲湖区建置撤销,大部分地区并入阿房区。1962年7月,莲湖区建置恢复,五一村为潘家村公社(又称四季青公社)五一大队。1965年10月15日,归西安市郊区潘家村公社管辖。1980年4月,郊区建制撤销,潘家村公社归雁塔区管辖。1982年1月14日,居住和花插于城区的雁塔区潘家村公社下辖的西关、北火巷、安定、五一、潘家村等27个大队划归莲湖区管辖,同年3月2日潘家村公社撤销,设农副局管理农村生产行政事务。1983年1月,西关街道办事处划出西关北廓城墙以外以北地区成立环城西路街道办事处。1985年,人民公社建制撤销,五一大队设行政村,五一村村民委员会成立,下设村民小组,归莲湖区社区农副局管辖。2002年1月,五一村归莲湖区社区经济局管辖。2006年

9月,五一村撤村建社区,全体村民转为居民。2008年1月,五一社区归属环城西路街道办事处管辖。

解放后,五一村人一直从事背天面土的蔬菜生产,1959年9月,当时五一生产队被称为五一连(军事化编制),成立四个公共食堂。1964年10月,五一大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上自书记,下至生产小队长等40多名干部统统进行审查。是年,大队贫协成立,生产队成立贫协小组。1965年5月20日,社教运动中,撤销朱忠信党支部书记职务,给予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3名党员被开除党籍,2人戴上“四不清”帽子,28名干部被错误地多扣了工分。是年,补定阶级成分,贫农升中农一户,贫农、佃中农上升到中农5户,中农、小土地出租升地主7户,运动造成的冤案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生产受到冲击。第四生产队一度被夺权。1969年,第五生产队1968年办的纸盒厂由大队经营,取名“西安市环西纸箱厂”。1971年,蔬菜种植基地面积亩产达到9171公斤,播种面积亩产3503公斤,创造了两个单产的最高记录。是年,办起五一农械厂。1974年,办起木材加工厂。1978年,改革开放,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协组织名存实亡。1978年村民人均收入306元,仅能勉强维持生活。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耕地逐年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村党支部带领广大村民坚持走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规模经济的致富之路,充分利用地域优势,集

●我们的村落●

中财力人力发展村办企业，把历年来国家征地补偿款和公积金全部投入到开办企业上。1979年，全村实行退休制，男性村民65岁，女性村民62岁即可退休。是年，打破原有小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建立起以村为单位，统一土地管理，统一资金使用，统一干部调配，统一分配的新型管理体制。

1980年至1986年是五一大队办二、三产业大发展时期。

先后办起针织厂、标准件厂、安装队、停车场、旅游社、月季园、通惠贸易公司、华夏电子公司、玉祥饭店、房地产开发公司。到1986年全村形成4个工厂、6个商店、2个旅馆、一个住宅开发公司、1个村办中心医院分院、一个合作经营的4星级酒店、3个蔬菜作业组的多种产业经济新格局。全村747名劳力中669人从事村办企业，78人搞农业，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1346元，比1978年增长4倍多。

是年队办企业所产值首次突破百万元。

是年，村大队所有企业(包括农业队)实行联产联值的承包责任制。

是年初，与西安市一中合作建立益新中学。

1986年，村办企业总产值达到1.14亿元，比1983年增长2.5倍。是年，依法成立了西安市五一城中村改造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中村改造分四期进行。城中村改造建设用地293亩，建筑面积60余万平方米，分四期建设完成，目前一期工程“五一锦苑”、二期“通惠锦苑”已经完工并入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五一村完全摆脱

了农业生产，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市场变化，果断地改变原来的“横向发展，敢当配角，与大工业接轨”的发展思路，实行了“退二进三”的经济结构调整，工商业才有了新的发展，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厂长(经理)负责集体承包制——股份制——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制，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民收入大幅提高。2005年社会总产值达到1.36亿元，上缴税金586万元，人均收入2.48万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06年1月，玉祥门工业品批发市场整体搬迁至朱宏路北二环外100米外，改名“西安玉祥工业品批发市场”。新市场占地80亩，营业面积3万平方米，商户1000多家。是年9月，五一村撤村建社区，全体村民转为城市居民，村委会改为五一社区。2010年10月18日经共青团莲花去环西街道工作委员会批复，成立共青团五一社区(村)工作委员会。

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全体村民又变为股民。

1993年被评为省级先进村，1998年被评为省级小康示范村，2006年，在第四届“中国十佳小康村”评选活动中，五一村被评为“中国十佳小康村”，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村子。

村民素质教育

1982年，五一村工商业已经发展到13个，有职工361人，这些企业需要财会人员，各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但是，当时人才极为缺乏，村里原有的管理干部大都是半路出家，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以至于用合作化

时期的老经验管理企业,闹出许多笑话。安装队掏钱请仪表厂的技师,好端端一个地处繁华地段的玉祥门食堂关门,铸造厂濒于倒闭。

面对村办工商企业蓬勃发展,而又缺乏人才现状,村党支部决定智力投资,培养人才。

为了建立一支有觉悟、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队伍,村委会投资 5000 元,于 1983 年 6 月建立了五一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成立了校委会,聘请了专业教师,把原来能容纳百余人的会议室设为教室(约 100 平方米),购置 40 余套桌椅,黑板、图书、教具等,教室安装了 6 个 40 瓦日光灯和吊扇。到 1987 年,先后开设一期初中文化班,学员 45 人;一期高中文化班,学员 50 人;一期工业企业管理班,学员 43 人;两期商业会计学习班,学员 91 人;两期工业会计学习班,学员 91 人;一期服务员培训班,学员 43 人。共有 363 人参加了农校学习,占从事工商企业总人数的 65.7%。同时杜绝中、小学生辍学。1985 年,村办企业大发展,劳动价值在 7 万元以上,因而有不少村里上学的学生想中途退学返乡参加劳动。村“两委会”规定:小学毕业没有考上中学的返乡学生不安排劳动,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的返乡青年,安排一般性劳动,按两年临时工对待,每月 40 元工资,并不得进入村办企业。使村里青少年的入学率占应入学率的 97.7%。1983 年 3 月,村里成立了幼儿园,按照幼儿教育大纲开设课程,购置了风琴、录音机,中小型玩具,轮子秋、压压板等活动器材。以《农民法律常识读本》为教材,开设法律常

识课。全体村民人手一册,结合制定村规民约,向村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取得明显效果。1985 年以前,村里有 9 人触犯刑律。1986 年以后,仅有一人少管,犯罪率明显下降。

农校在村“两委会”领导下实行校长负责制,健全考勤、考核、结业、奖惩学籍制度外,还明文规定听课制度、学分制、考试制度、奖惩制度。每期末,考试成绩在 80 分以上者奖 20 元,品学兼优名列前 3 名者奖 50 元,拿到高中结业证的奖 300 元。对出勤差,成绩差的学员除扣工分还不准上岗,不准进入企业。由于奖惩分明,调动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到课率保持在 90%以上。

除了课堂教学,农校还坚持开展岗位培训,为企业服务。1984 年以来,在全村高中毕业生中,择优报送 10 名青年到西北电子专业班脱产学习一年,学习归来开办了华夏电子厂。1986 年,为满足村幼儿教育事业的需求,又选派 9 名青年外出学习,其中 2 名在西安交大财会辅导班学习,2 名在西安市幼儿师范学习,5 名在东城高级职业学校家用电器班学习。同时,还组织玉祥饭店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走出去到西安宾馆、钟楼饭店、小寨饭店进行岗位培训。请会计师,辅导财会人员处理比较复杂的账务,请进西安仪表厂的技师培训仪表器安装人员。

至 1987 年,全村 576 名青壮年中,450 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 103 人,大专文化程度 19 人。各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已达 206 人,比 1983 年增长 52%。



西关村(西关社区)

西关村域内的环城西苑

地处西门外西关正街，是一个村民居住分散、居住地距离跨度较大的村子，村民聚集在南北各条巷中。下设三个村民小组。2011年，全村共有 1278 人。一组 357 人，主要分布在西关正街路南，南小巷、介家巷、八家巷及丰庆路北，丰盛巷等地段。二组 433 人，主要分布在西关正街路北，新民巷、兴学巷、西稍门、劳动路等地段。三组 488 人，主要分布在西关正街路北、王家巷、梁家庄、铁塔寺及丰庆路南西关新村等地段。

此地是通往西北各省的门户，这里的世居者多以耕读为主。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战争、饥荒，容纳了许多做小生意的、投亲靠友的、逃荒要饭等外省人员，其中有的在西关城墙的战壕内，挖窑洞栖身。一些人靠给有田户种菜帮工来谋生，有了一定积蓄后置地建房。年复一年，繁衍生息成了西关的老住户。

传说南小巷外现在的税务局位置，在清

朝以前，叫老龙潭——是皇上到开春时间扶犁耕地的地方，以表示对农耕的重视。

据老一辈人说，介家巷介户人家是介子推的后代，明洪武年由山西迁徙到介家巷定居，并在介家巷东头划地建庙，为了纪念介子推母子被封称为“火丹圣母庙”。

西关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虽然没有出过帝王将相之类杰出的人物，但也有对人民、民族有过功劳的先辈，一组的介鸿勋同志曾参加过中条山的抗日战役；介文焕同志和二组的李志忠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还有三组的王松柏同志在西藏平叛中英勇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从 1953 年农村互助组发展到 1955 年的高级社，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由西关村、草阳村、西门里的安定队联合成立了综合队，分成了 7 个生产小队，土地面积分布广，南到沙井村，西到黄沙岭、鱼化寨，北到阁老门，以种菜为主，还经营有奶站、自行车

修理部,有十多辆马车的运输队等行业,从业人员不单是村民,还有广仁寺的喇嘛、西五台的尼姑、基督教的神父,都加入了西关综合队。

此间,综合队的各项工作一直都名列前茅,西关村的带头人,时任党支部书记王志学同志曾三次被选为市级劳动模范,市人民代表,并赴北京观礼,受到周总理的接见。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集体化生产的不断进展,综合队分为草阳村、安定队和西关村三个村子。

1964年社教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村办的铁工厂,被定位为地下黑工厂,予以关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但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

在计划经济时代,以集体生产为主体,以完成上级下达指标为任务,以种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经营方式,直到改革开放逐步进入到市场经济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因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蓬湖区经委及三机局征用了各组的部分土地,带走了部分青年到征地单位下属一些企业单位参加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企业改制,兼并等各种原因,使征地带出去的大部分人员失去了工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至全部又回到各小组。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应运而生,由于本村地处城乡结合地,土地面积因国家建设而逐年减少,劳动力逐年增加,形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产生大量过剩的劳动力。于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耕种发展到多种经营,各组相继办起了队办企业,一组有复合板厂、汽车修理厂、五金通用设备厂;二

组有山货店、旅社、停车场;三组有五金店、旅社、沙发厂、食堂、汽车修理厂等。后来由于管理及技术等多种原因,由村组自主经营的方式逐步转变为对外房屋出租的形式,村组在临街地段都盖起了门面房、库房,村民也都在自家的院子里盖起了多层式楼房。有效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由于土地的逐年减少,为解决部分村民和嫁城姑娘户的住房困难问题,从1998年至2008年逐步盖了多层楼房22栋、高层1栋。不仅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还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提高了经济收入。

近年来,市政府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展现现代化城市都市风貌,加快城中村建设步伐,2003年环城西苑的建设,2006年西关正街道路拓宽工程及2007年大唐西市的建设,占用了西关村的大量土地,拆迁了相当一部分村民的宅基地,到2010年底丰庆路的前期拆迁改造建设工作准备就绪。村组领导始终积极配合上级组织的工作,给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其间无一人上访闹事,促成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社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并得到上级的肯定,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多年来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先进集体等光荣称号。

因地理条件和经营模式的逐步改变,2006年农转非,以2008年4月30日为基准日进行了改制,由原来西关村委会改为现在居民委员会,并以村组为单位,成立了股份公司。目前集体及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房屋出租。

户县龙窝酒 手工酿造技艺

◎ 富小云 整理



早在一百多年前，在户县涝店镇龙窝村居住着晋、冀、鲁、豫，以及湖北、湖南等地来自五湖四海的村民，这些杂居的村民选择三水(涝河、甘河、渭河)环绕，水美田壮的龙窝村为栖息地。村子当时有四十余户人家，其中有一户来自河南卢氏县姓费的一家，有一位壮年男子名叫费永泰，身怀绝技，曾经是河南宝丰酒厂的“大师傅”。当时由费永泰挑头凿井取水，建造烧坊，烧出了清香甘冽的第一碗龙窝酒。后经发扬光大，惠及乡里，一传十，十传百，龙窝酒香飘四方，由一个小作坊发展成关中地区老字号的白酒品牌。

古时候，烧酒的技师尊称“大师傅”，关中地区百姓习惯口语叫“把式”。从清朝到民国，费家是龙窝酒的主要传承者。民国时期，龙窝酒享誉关中，有“东龙西凤”之美誉。1936年双十二事变，杨虎城将军派4名官兵到龙窝酒烧坊专程押运两大车龙窝美酒，款待东北军，杨虎城将军亦用龙窝酒宴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前民盟中央主席杨明轩20世纪40年代任职陕西期间，也喜饮龙窝酒，户县至

今仍流传着“喝了龙窝酒，民盟党中称魁首”的佳话。

龙窝酒酿造技艺在承传古法中被历代师傅总结为九句口诀，即：“人得其诚、水得其甘、曲得其时、粮得其实、器得其洁、工得其细、拌得其准、火得其缓、酒得其真”。其知识、经验、准则自成系统。龙窝酒是关中地区传统酿造工艺的典型代表。

龙窝酒的酿制用曲为中温曲，采用关中地区优质小麦、大麦、碗豆三种原料，工艺采用古法制曲，经人工踩坯，入室发酵而成。龙窝酒的酿造酒原料采用关中地区的优质高粱、玉米为原料，以稻糠皮为辅料。工艺过程包括润糝、清蒸、加浆、摊凉、加曲、入窖、发酵及蒸馏等，其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独特的知识、经验和操作准则。龙窝酒的繁杂工序都是手工完成，这是一种完全依赖感性和经验的操作过程。一百多年来，其工艺技术全靠师徒传承，经过一代代“酒把式”的不断实践，龙窝酒酿造技艺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知识系统。它是在关中腹地的自然背景下形成

的,从原料特点到制曲和发酵,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和关中的气候相适应,是关中古法酿酒的杰出代表。百余年来,龙窝酒作坊一直延续着祭拜龙王和酒神的传统,这种习俗和其酿造技艺共同构成了古代酿酒文化最为完整的历史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龙窝酒酒体透亮,清香醇厚,甘冽爽口,它以“清、爽、甜、净”的清香型酒体风格。受到关中百姓的喜爱。龙窝酒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在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户县、周至、长安、兴平、咸阳和西安等大小商铺都有地道的关中特产——龙窝酒。

1976年,户县人民政府在原龙窝酒老作坊的基础上投资兴建全民所有制的户县龙窝酒厂。企业以生产“龙窝”牌白酒为主,产品行

销全国14个省市。1978年广交会获优质产品奖。1979年被陕西省轻工厅评为省级一类白酒。1980年被西安市商贸委评为西安市优质产品奖。20世纪90年代初,因龙窝酒的生产 and 经营一直停留在传统工艺和简单的市场行销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小酒厂因更新滞后,营销手段落后,逐渐和市场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企业一度处于半停产状态。2004年户县龙窝酒厂经过改制,更名为西安塬酒坊酒业有限公司。2006年西安塬酒坊酒业有限公司启动龙窝酒传统酿造工艺,保护和发展龙窝酒原产地酒文化的项目工程,龙窝酒文化和传统酿造技艺得到恢复和发展。

2009年6月,列入第二批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解字·

刀



①



②



③



④

这就是“大雪满弓刀”的“刀”字。甲骨文①的上部是刀柄,下部是刀头,是带“刃”的部分。②是金文的形体,大体上与甲骨文相似。所以“刀”字是个象形字。到了小篆③,刀柄成了弯曲形,不过还有点“刀”的样子。可是到了楷书④,那就一点也不像“刀”的形状了。

“刀”字除了其本义当“刀枪”的“刀”讲之外,还有另外的两个词义我们要注意。比如有的人在读《荀子·富国》时,把“厚刀布之敛”,解释为“用厚刀割布”那就错了。其实古代的一种金属货币的样子像刀,所以称为“刀布”(“布”是古代的一种钱币)。所谓“厚刀布之敛”,就是“加重货币税收”的意思。这是其一。其二,在《诗经·卫风·河广》中有“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话。你可千万不要解释为“谁说黄河宽呢?连把小刀都容纳不下”。这就把“刀”字完全解释错了。这里的“刀”当“小船”讲,后世则常写为“舫”(dāo 刀)。

“刀”字作偏旁用的时候,就写作“刂”,同样也是两画,均在一个汉字的右侧,称为“立刀旁”或“侧刀旁”。凡是从“刂”的字,大都与“刀”的作用有关,如:“刃”、“刑”、“剃”、“利”、“割”、“剖”、“剥”等字。



羊年 说羊

羊伴随人类的时间之久远、与人关系之密切,的确值得大书特书。因其形体适中,攻击力差,对人几乎毫无威胁,不似豺狼虎豹之凶猛令人毛骨悚然,于是便成最理想的狩猎目标之一。又因其食之者草,产出者奶、肉、毛、皮,加之其性格温顺,易于驯服,故而成为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古人以“马牛羊鸡犬豕”为六畜,羊“榜”上有名,且位居前列,足以说明其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羊可承载艺术。由于其很早便走入人类视野,因而在早期原始文化遗存中活灵活现,犖犖大观。斑驳的岩画中,有它们壮硕的身影;陶器的图案里,有它们美丽的面容;从商代的“四羊方樽”、“三羊铜罍”,到汉代的“羊型铜灯”、唐代的“三彩陶羊”,直至当今的年画、剪纸等各种民间工艺品,羊的各种形象随处可见,给世代的人们带来了莫大的审美享受,成为人们生活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羊可代表美丽。汉字中的“美”字,即由“羊”和“大”两字组合而成。羊大为美,乃古人

实用主义审美倾向的生动体现。

羊可充作美食。“鱼”和“羊”结合便成“鲜”字,折射出古人口福不浅,不禁让我等垂涎欲滴。

“羊”字孕育文化。古人以象形之法造出“羊”字,又因之大展其用。《汉字大字典》中,以“羊”为部首的汉字竟多达 204 个,充分说明其对先民生活影响力的巨大。不知不觉中,羊的影响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目不暇接。

羊曾陪伴英雄。据《汉书·苏武传》,汉中郎将苏武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匈奴单于背汉妄为,扣留苏武并遣其牧羝羊(公羊)于北海之滨,并扬言“羝乳乃得归”。苏武与羊群为伴,手执汉节,饿吞草籽,渴饮雪水,而不辱使命。直至 19 年后单于回心转意,苏武才得返长安,受封典属国,留下千古佳话。

羊可启发智慧。据《战国策·楚策四》载,楚怀王听信张仪花言巧语,入秦而被囚禁。襄王即位,不思进取。良臣庄辛进言而不纳,便避走于赵。不久,郢都被秦所据。襄王悔,寻见庄辛。

庄辛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来鼓励襄王应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用于此处，既通俗易懂，又言简意赅。

羊可象征安泰。古语有“三羊开泰”之说。考“三羊开泰”本应作“三阳开泰”，最早出自《易经》。《易经》以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指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是吉利之象征。对“三阳开泰”的另一种解释为：11月冬至日的白昼最短，其后则白昼渐长。古人以为此乃阴气渐去而阳气始生，所以称冬至一阳生，12月二阳生，正月三阳开泰。因此，旧时常用作新年起始的祝愿之辞。而“羊”与“阳”同音，久之便讹为“三羊开泰”。后人附会出“三只大角羊聚立于一处”之特定造型，成为妇孺皆知的吉亨之象。

羊可体现正义。因羊在古人心目中拥有的正直、美好形象，久之便将其神话为正义的象征。据王充《论衡·是应》，唐尧之臣皋陶治狱，辅以独角之羊。此羊对嫌犯“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极为灵验。至战国时，秦楚等国御史、狱吏等执法者皆着带有独角神羊图案之冠服，以示庄严神圣。此独角羊名“獬豸”，作为秉公执法的象征，其形象一直用作历代执法者官服图案，直至清末。

羊性素喜清洁。羊愿居于干燥整洁之处，饥餐青草，渴饮清泉，洁身自好，远离污秽。不像某些畜类，终日嬉戏于泥淖之中，饮溺餐矢，藏污纳垢，顾盼自得，不以为耻。

羊虽娴静优雅，人见人爱，却亦小有缺憾，即反抗性差，斗争精神欠缺。即使是被宰

杀，亦只低吟一声，便引颈就戮。颇不似猪，虽不能逃命，却愿引吭高“歌”，尽其所能，声嘶力竭，气冲霄汉。猪羊相异至此，其中必有缘由。据民间传说，猪、羊皆因被人宰杀而心中不平，且萌生与上帝（老天爷）讨还公道之念。羊动作轻盈，脚下生风，先得接见。上帝听罢莞尔笑曰：“猪羊猪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尔等终日无所事事，专靠人类饲养，却不许人类食尔等之肉，则要尔等何用？尔等应予理解。回去转告胖猪先生，其应泰然处之，不必再劳前来。”羊闻此言，虽仍感悲哀，但思来想去，却觉合乎情理。无可奈何之余，只得打道回府。遇胖猪于途中，只见其气喘吁吁，步履维艰。羊将上帝之言转达。猪心中忿忿，仍觉不公。羊将其强拉硬拽，拖回住所。此后，羊面对屠刀只有叹息；而猪因思想不通，便大喊大叫，直至气绝。

或许是受源远流长、家喻户晓的生肖文化之影响，国人中对羊年持偏见者颇不乏其人，认为羊年生子命运不佳，以致马年之尾，产妇云集；更有甚者，竟不惜提前剖腹，以避其子生于羊年之“厄运”。此举不仅从科学角度而言毫无根据，且就文化传统而论亦属无稽。另一方面，似羊固然不甚惬意，似马亦好不了许多。其实，如此为避羊年而提前剖腹之流，才真正是自寻烦恼、自交“厄运”之辈。

冬去春来，周而复始，12年一循环，直至地老天荒。岁月不居，人生苦短。值此岁末年初，我们似应念马之崇德，扬羊之至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为追求美好明天而戮力同心，发奋进取！

中国古代公务官员的退休年龄

随着中国老龄化加速到来，中国却尚未进入发达社会，所以老龄化对经济生活甚至人们的心理感受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针对这种在全球都极为罕见的“未富先老”现象，有人提出要延迟职工退休年龄，即从 60 岁变成 65 岁，用提高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来缓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不管此建议能否真正施行，我们倒是可以在历史的纵向比较中，看一看中国古代公职人员的退休年龄标准。

70 岁退休是传统规定

官员“退休”，在古代有一个非常文雅的叫法——“致仕”。所谓“致仕”，就是离开官场和官位。西周以来，中国官员的退休年龄一般都是 70 岁。古人认为，70 岁是一个人完全衰老的界限。70 岁之后，人就“耳目不聪”，各项生理机能都迅速衰退了。不过，70 岁绝对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历朝、历代政府官员的退休年龄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调整。汉代之前，官员“退休”都还只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真正将其制度化、明确化，应该始于西汉。

汉代，官员法定退休年龄依承古制，为 70 岁，但也有很多官员或因帝王的宠信、或因自己舍不得官职权位，年过七十而不致仕。从退休程序看，官员在正式退休之前，要本人主动申请。而有些官员过于“恋栈”，即便年老体衰，也不主动申请退休，一直赖在官位上不走。有鉴于此，后来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专门写诗予以讽刺：“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

当然，年龄只是汉代官员退休的标准之一。如果身体条件不允许，那么 70 岁之前也可以退休回家养老。不过，更多时候，汉代官员的退休是因为年岁已高乃至病痛在身，已然完全不能满足做官的精力需要。故而 70 岁的年龄标准，更多只是一种指导性的政策，而非强制性的。换言之，年龄只是退休形式上的条件，而实质条件则是身体状况。

所以，汉代以后，中国古代政府官员退休的年龄标准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官员因生病而没有主动辞职，朝廷也以“解职”的方式命令其退休。例如，晋代的张凯官居“廷尉”（中央掌管刑事与司法的高官）之时，因疾病被解职；还有的官员想抓紧时间著书立说，也会选择退休归隐，如南北朝时期的官员何尚已经位居“太子詹事”（主管太子起居的高官），就毅然为了写作的夙愿而主动离开官场，并最终以著作永载史册。

唐代官员退休的年龄更是灵活，70 岁的“红线”虽在，但可视其年龄、身体和政绩等状况，或提前、或推后致仕。如唐朝初年的功臣中，唐太宗最宠爱的杜如晦，退休时才 45 岁，魏征 57 岁，李靖 64 岁，都没超过 70 岁。当然，也有的功臣，如虞世南 81 岁才退休。唐玄宗时期的诗人贺知章更甚，任职到 86 岁。还有的官员会一直干到死。例如，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良嗣已年高 85 岁，仍不退休，直到有一天他去朝见武则天时，跪在地上就站不起来了，被人抬到家中，当天便去世了。

从 70 岁向 60 岁过渡

唐代官员在退休之前，都必须写书面申请，按照级别不同，退休的批准机构也不同。一般五品以上的，必须皇帝亲自批准；六品以下的官员，上报尚书省（唐代的国家行政机关）就可以了。宋代依然把 70 岁作为退休的年龄标准，因 70 岁被称为“引年”，因而“引年”就成为官员退休的代名词。

宋朝自太宗科举取士的名额大幅度“扩招”和官员子弟继承官位普遍化之后，冗官、冗员的问题非常突出，官员队伍严重老龄化，很多官员年逾七十仍不主动退休。有鉴于此，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监察御史曹修古向仁宗皇帝建议，除个别对国家贡献极大的老臣之外，那些超过 70 岁的官员，应想法引导他们写退休申请；对那些拒不写申请的顽固分子，应强令他们退休。仁宗批准了曹修古的建议，并在全中国实施。

其实，宋代之前，官员赖在官位上不肯退休的恶习就长期存在，而宋代官僚体系的官职数额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超标，这就造成宋代官员老龄化、行政效率低下、官场人员缺乏必要流动性的现象非常突出。但因 70 岁的退休标准古已有之，宋代也只能在局部和具体问题上修修补补，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并无太多有效的制度化建设。

金朝是宋、辽之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它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中国古代“七十致仕”的老传统，为官员退休制度的改革打开了一个意义巨大的口子。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皇帝对一位丞相的退休申请做出批示，认为他未过 60 岁，不允许其致仕。这表明当时中央高官退休的年龄已经变为 60 岁了。不光中央，从大定十八年（1178）开始，到金朝

灭亡（1234），地方官员的退休标准也已经普遍定到 60 岁。不过，“七十致仕”的传统惯性委实太大，依然对金朝官员的实际退休年龄起着极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国家重臣，有很多 70 岁以上才退休。

退休年龄的灵活性和合理化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在洪武十三年（1380）也把文武官员的退休年龄由传统的 70 岁改为 60 岁，但仅仅持续了 13 年就宣告结束。这其中的原因并非朱元璋认识到官员 70 岁退休的不合理性，而是退休成为他打压甚至诛杀开国功臣的借口和手段。为了肃清功臣对政权的影响力，朱元璋从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即以 60 岁的退休年龄迫使很多开国老臣“被退休”，起到了大权独揽的专制效果。13 年之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当所有对朱元璋有威胁的老臣都被清除之后，朱元璋就恢复了 70 岁退休的祖制。

清朝官员的退休年龄仍以 70 岁为普遍现象，但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文官和武官的差别很大。清朝文官的实际退休年龄跨度很大。例如，康熙年间的工部侍郎田六善 59 岁时申请退休，被康熙皇帝驳回；两年之后，61 岁才被批准退休。其退休年龄倒是非常符合现代人的标准，也符合人的基本身体机能特征。而咸丰年间的礼部侍郎陶梁，85 岁才得以致仕，真可谓老当益壮。有的人在高龄之年还能继续升官。例如，乾隆年间的举人陈朝珍，年过八十，还被推荐升任国子监“典籍”（古代中央大学的重要官员）。

中央“部委”的中下层官员则在乾隆年间定为 55 岁退休，当然前提是官员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身体还好的，可以继续留任。但留任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制，这取决于官员考

宋朝借高利贷没钱可押妻女

宋代，官营放贷机构叫交子务、会子务，私营的叫交子铺、交引铺、钱引铺。私人第一放贷人叫钱民（钱人、钱主、库户），第二放贷人叫行钱（行人）。田契、地契、金银器是最好的抵押品，无财产抵押，可以质押妻女。

《水浒传》里，西门庆发家致富后，四处放款，并不是搞慈善；鲁达寄身的五台山文殊院，借本钱给商人，也不是乐善好施和无偿免费。

闲钱多得烫手的“钱民”，业务巨忙，分手乏术，遂委托、雇请“行钱”为代理人，代为放债经营。至于利息，共同瓜分，瓜分比通常是五五开。“行钱”无本取利，自然积极性高。这二者类似房地产老板和售楼小姐，售楼小姐手段越多，卖楼越多，楼价越高，提成越多，若卖掉 N 亿的楼盘，还有年终奖 500 万给你拎回家。

王明清的《投辖录》说，开封有个“大桶张家”，超级土豪，手下一大班行钱。某天，张家的二世祖到行钱孙助教家做客，老孙办酒置席款待这爷，喊闺女劝酒，“容色绝世”，二世祖要求娶做媳妇。老孙眼睛一亮，却怪不好

意思地说，我是您老的家奴，家奴做了郎主的丈人，会被亲邻笑话的。

洪迈的《夷坚志》说，江西抚州有个贩布起家的陈泰，发财后，放高利贷给附近州县，生意红火。淳熙五年（1178），老陈到乐安县讨债，却小命呜呼。杀人犯叫曾小六，老陈的代理人之一。曾小六借了老陈 500 贯钱放贷，本赚利，利滚利，发了财，当了“甲首”，开了货栈，存布几千匹，但想做“老赖”，于是直接干掉老陈。

这两个故事说明：第一，行钱与钱民，类似伙计与老板，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是纯粹的货币依附关系，因此风险较高，比较考验人品。第二，行钱们哪怕自称奴才，但绝非下层百姓，曾小六是“甲首”，老孙是“助教”，均属地方势力的代表。第三，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又转化为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资金。第四，钱民寻找代理人经营高利贷，在宋代相当普遍。第五，大款钱民的高利贷活动，范围很广，与行钱上下勾结，结成一个相当可观的高利贷网络。

如果行钱办事靠谱，钱民信任，有时还代替钱民去经营大宗买卖。《夷坚志》记载，泉州王元懋“所蓄奁具百万缗”，“主舶船贸易”，淳熙五年，委派行钱吴大做全权代表，带领 38 人的贸易团队，出洋搞贸易，一去 10 年。

（上接第 47 页）核的成绩，考查成绩非一等的，年满 65 岁必须退休。

武官中，提督（一省的最高武官）和总兵（仅次于提督的高级武官）等高级武官大体没有退休的概念，基本上活到老、干到死。而副将及其以下的武官，包括参将、将击、都司、守

备、千总、把总等一律在 45—54 岁退休。级别越低，退休的年龄就越早。相对于文官提前退休，其用意无疑是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并使得低级的年轻军官可以更快地升职，提高他们为国防和军队献身的动力。

乾隆皇帝组织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从1773年开始,历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藏于四库,故名四库全书。有学者称赞道:《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四库全书》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世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国之宝”。然而,《四库全书》果真是乾隆的“文治武功”吗?

清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远超康熙、雍正两朝,但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行的,因为还有成千上万不利大清皇朝统治的书。于是乾隆搞了两手抓:一手搞文字狱,疯狂地进行文化杀戮;一手搞文化整顿,编纂《四库全书》,搞“统一答案”。一方面大搞文化工程;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搜书、焚书。旧书新书凡是有诋毁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或抽毁或禁行或全毁,作者一被举发,或充军或杀头。《四库全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纂的,成为清朝唯一允许留下来的“文献”,但这是经过“消毒”后的统一口径,经过整容后的恩准“文明”。

《四库全书》,这个“中国文化史上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寓禁于征”,是一场打着文化工程旗号的文化浩劫。名为“稽古右

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书2453种,抽毁书402种,铲毁、烧毁书版50种8万块,销毁石刻24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余种,所焚书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可见,乾隆是以修书的名义搞烧书。他修了一半,却同时毁掉一大半,修的一半还大肆篡改。同时乾隆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杀戮中,文字狱罹难者的鲜血染红了刑场,京城焚书的火光映红了苍穹。这是惊人的文化犯罪,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在乾隆的“两手抓”之下,中国文化上千年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几被摧残殆尽,一帮阿谀奉承“奉旨写作”的御用文人与《四库全书》一起留下来。

章太炎沉痛地记述道:“满洲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减耶?”“乾隆焚书,其阴鹭不后于秦也!”鲁迅先生指出,他们“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现代历史学家吴晗评价《四库全书》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避席畏闻文字狱”是当时文人士子风声鹤唳般的真实写照,气节、思想、民权想都别想,“著书都为稻粱谋”。

《西安年鉴(2014)》荣获第五届 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综合特等奖

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年鉴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结果正式揭晓。由西安市政府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承编的《西安年鉴(2014)》继1999年第二届、2004年第三届、2009年第四届后,连续第四次荣获最高奖项“城市年鉴综合特等奖”,并且首次实现“大满贯”,在“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装帧设计”三个单项奖评比中均取得“特等奖”的优异成绩,进一步巩固了在全国年鉴界的领先地位。《西安年鉴



(2014)》于2014年10月出版发行。全卷100万字,全面记录了2013年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全省首部开发区志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志(1993—2012)》 正式出版发行

为了全面总结建区20年的发展历程,更加深入地研究谋划开发区长远发展,2012年以来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全面启动了《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志(1993-2012)》(以下简称区志)的编纂工作。三年来,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经过精心编纂和反复修改、完善,区志先后十二易其稿,于近期由陕

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区编纂的首部志书,是西安市和陕西省编纂的首部开发区志书,也是经开区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志(1993-2012)》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我区建区20年的创业历程和发展成就,全志12篇、48章、149节、约100

余万字,涵盖了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社会事业、党政群团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各方面,是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开发区、认识开发区、服务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资政作用和存史价值。

近日,党工委、管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志(1993-2012)》正式出版发行为契机,做好读志用志工作:一是牢固树立“修志为用”的观

念,组织开展读志用志活动,进一步了解开发区、认识开发区,更好的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二是切实发挥好区志的重要作用和史料价值,进一步推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以区志为载体,深化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弘扬区域文化,更好的宣传开发区、推介开发区,不断扩大开发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对外影响力。

(西安经开区管委会)

《高陵县志(1990~2010)》通过复审

《高陵县志(1990~2010)》复审会于2015年4月9日在高陵县召开。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张帜,高陵县副县长王小玲,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处长张世民,《高陵县志》复审组成员及该志全体编纂人员参加了会议。

《高陵县志》复审稿上限1990年,下迄2010年,全书共26篇,近140万字,由高陵县地方志编委会人员历时11年辛勤编纂而成,于2014年11月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复审。该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高陵县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高陵县志》复审组认为该志稿政治观点正确、篇目设计基本合理、语言平实流畅、资料相对充实,能够体现高陵地域特色,反映1990~2010年间高陵县在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突

飞猛进地变化,具有一定的存史资政价值;同时又对志稿体例结构、内容记述、行文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而操作性强的修改意见。

冯艳阳主任代表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宣布《高陵县志》通过复审,并要求高陵县进一步做好二轮修志工作,于年底前启动年鉴编纂工作,及时反映社会发展动态;提高对地情网站和地情丛书的重视,善于发掘县内地情资料;加强人员队伍和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建设,为下一轮修志工作打好坚实基础;同时要求《高陵县志》编纂人员认真梳理审稿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修改方案和措施,进一步充实资料,提高志稿质量,为报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终审打好基础。

最先和西安结为友好城市的外国城市

最先和西安结为友好城市的外国城市是日本的奈良市。自公元 655 年至 784 年日本的几代天皇都在奈良建都,1898 年设市,市内的平城京就是仿照我国唐都长安城建造的,距今已有 1260 年的历史。该城于 1974 年 2

月 1 日和西安结为友好城市。两市互访互助友好往来频繁,特别是文化交流如书画活动等不断举办,对加深中日友好起了积极的作用,以至后来影响到日本长野县等地,都和陕西、西安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

西安最早形成回族聚居的时代

西安最早有回族聚居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以后,因这时阿拉伯帝国的使者首次来长安,中阿之间有了正式外交关系,当时,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的商人、宗教活动家

和阿拉伯使者陆续来长安定居,长安从此有了回族人聚居。回族文化、伊斯兰宗教随之也引进了中国。

· 解字 ·

刃



①



②



③

这是与敌展开“白刃战”的“刃”字。甲骨文①是刀头向右歪的一把刀,在其刃部加一个点儿,作为指事符号,表明此处最锋利,即刀刃所在。所以“刃”字在六书中就属于“指事字”一类。小篆②则大体与甲骨文的形体相似,只不过刀头朝左歪罢了。但楷书③则看不如刀刃的样子了。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刃”字除了当刀刃讲之外,还能引申为泛指刀的意思,如王充《论衡》:“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意思是:一个小孩拿刀与一个勇士战,小孩一定不胜。可见这个“刃”字,就当“刀”讲。再者,“刃”字本为名词,但有时也当动词用,如:“左右欲刃相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里面的“刃”字就当“杀”讲,意思是,左右的人都想杀掉蔺相如。

为什么人民币中没有3元？

3元人民币别说在中国罕见了，从古至今世界其他国家以“3”作为面额的货币也不多，因为货币面额的设计是有门道的，不然为什么印3元和7元的假钞很容易被识破呢？

古今中外，在钱币面额上使用得最多的是1、2、5、10这四个数字。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确定钱币面额等次时，最高面额与其他各种面额之间是整倍数的关系。

货币面值是依据数学的组合原理设计的。在数字1到10里，有“重要数”和“非重要数”之分，1、2、5、10就是“重要数”，用这几个数能以最少的加减运算得到另外一些数。如 $1+$

$2=3, 2+2=4, 1+5=6, 2+5=7, 10-2=8, 10-1=9$ 。其余的就是“非重要数”。而如果将四个“重要数”中的任意一个用“非重要数”代替，就出现有的数要相加或相减两次才能得到，比较繁琐。尤其是对于算数不太好的人来说，日常使用太不方便。

从概率学的角度看：在1至9的各种数字排列组合中，3的出现概率最多只有18%，而1、2、5出现的总概率则为90%。如果使用面值为“3”的币种，在流通中呈现的概率约为16.7%，证明以“3”为面值的货币在实际流通中找零替代的作用并不显著，反会使货币的票面结构有失衡之感。

十羊九不全的历史来历

传说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当“亭长”时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他追赶着一只大羊，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追上了。在制服羊的过程中，他拔掉了羊角，扯掉了羊的尾巴。梦醒之后，刘邦感到不解，便向几个上了年岁的人讲述了梦中之事。长者们分析后，告诉刘邦道，梦中所见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因为“羊”去了角，再去了尾部，就是“王”字。果然，后来刘邦比项羽先一步入关称王，后来又扫平群雄，建立了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汉朝。梦境的真假已无从考究，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羊”是吉祥的预兆。

但还有一个问题，“十羊九不全”既然口头相传了下来，必定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的。据有关资料：

1. 在清朝咸丰年间之前，并未出现过“十羊九不全”之说。相反，历史上认为属羊的命好，是安定富裕美好的象征。

2. “十羊九不全”是推翻慈禧太后的政治策略。因为慈禧太后(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生)属羊，为了推翻她，于是民间开始宣称属羊的命不好，从而在精神上对她造成打击。况且曾国藩、李鸿章都属羊，再加上清朝末年吏治的腐败，使百姓对属羊的几个王侯将相心生厌恶，导致了此传说。

3. 说十羊九不全是为了反对帝制的需要，袁世凯属羊，阴历八月十五生人。国民党为了推翻袁世凯帝制，咒骂八月羊挨刀杀。

由此看来，“十羊九不全”说法是近现代出于政治的需要，民间流传下来的。



“越明年”到底指哪一年

“庆历四年(1044)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这段文字是北宋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开篇一段话。其中“越明年”一句交代的是“重修岳阳楼”的时间。“越明年”究竟是哪一年呢?各类教材注释不统一,让人无所适从。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各种版本为例:1994年版注为“[越明年]到了第二年,就是庆历五年(1045)”;2002年版注为“[越明年]到了第三年,就是庆历六年(1046)”;2005年版注为“[越明年]到了第二年,就是庆历五年(1045)。越,及、到”。先释为“到了第二年”,后改成“到了第三年”,接着又返回

“到了第二年”。

把“越明年”理解成“到了第三年”似乎是对的。《王力古汉语字典》“越”字第一义项:“跨过,经过。……引申为时间距离的经过。”其后就以《岳阳楼记》“越明年”为例。“明年”即第二年;“越明年”当然是“到了第三年”。文章结尾说:“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可见范仲淹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从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的“庆历四年”,“到了第三年”,正是“庆历六年”。“重修岳阳楼”与范仲淹写文章在同一年,也符合常规。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范仲淹开篇就点明,这篇文章是应滕子京之约而写的,即滕子京“属予作文以记之”。滕子京是怎样嘱托的呢?据《湖南通志》载,滕

子京专门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名为《与范经略求记书》。“经略”是官名(宋有经略安抚司),范做过此官,“范经略”就是范仲淹。信开篇道:“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府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此信只写了月、日,没写年份。到底是哪一年呢?《宋史》中也没有记载。据《范文正公集》年谱,范仲淹帮助仁宗推行新政,遭受政敌攻击,自请外调,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知邠州(今陕西彬县),至十一月又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州)。由此可以间接知道,滕的信应该写于庆历五年(1045)六月十五日,因为当时范正在邠州经略安抚资政任上。如果是写于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范在邓州,就不可能“恭投邠府”了。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时间,信中也有记述:“去秋以罪得兹郡,……又明年春,鸠材僦工,稍增其旧制。”句中“去秋”的意思应该是“去年”(“秋”是“千秋万代”的“秋”,意思是“年”),写信在庆历五年(1045),这年的“去秋”是庆历四年(1044)。“去秋以罪得兹郡”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所述正好吻合。“明年春”的“明年”,是相对“去秋”而言的,指的应该是庆历五年(1045)。

很清楚了,滕子京庆历四年(1044)春被贬,庆历五年(1045)春重修岳阳楼,这年六月十五日写信给范仲淹,求范仲淹写文章,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范仲淹文章写成。

既然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时间是庆历五年(1045)年,那么“越明年”的意思就不是“到了第三年”,而是“到了第二年”,又如何解释呢?

这里关键在对“越”的理解。《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孔安国注:“于已望后六日二十一日。”孔颖达疏:“其日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于已望后六日乙未为二月二十一日。”“既望”或“已望”即过了望日,也就是十六日,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正好是六日,所以“越六日”是“于六日”的意思。既望十六日是庚寅,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正好也是六日,同样说明“越六日”的意思是“于六日”。二孔都将“越”理解成“于”。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其中“越三月”,也是“于三月”的意思。

把“越”理解为“于”,“越明年”就可以解释成“到了第二年”,指的就是庆历五年(1045)了。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范仲淹是进士出身,写这么一篇短文为什么用了一年多时间?古时交通不便,从湖南到陕西又路途遥远,单程信函也要历经数月。再加上范当年再贬邓州,又诸事繁多,据说还身罹疾病,庆历六年(1046)九月写成文章,也在情理之中。再说,滕子京于庆历五年(1045)春天开始重修工作,以当时的建筑水平,完工可能到庆历六年(1046)了。范仲淹完成文章的时间,也未必很晚。



清明夜

◎ (唐)白居易

好风胧月清明夜，
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
遥听弦管暗看花。

作品赏析

当时清明节习俗很多，除了上述四种主要活动以外，还有许多失传的风俗，如古代曾长期流传的射柳、打秋千、踢蹴鞠、斗鸡走狗、放风筝等。据载，辽代风俗最重清明节，上至朝廷下至庶民百姓都以打秋千为乐，仕女云集，踏青之风极盛。

踏青又称“寻春”、“春禊”，晋代已盛。清明时节也是人们春游的大好时光，在春光明媚的清明前后，尽情地亲近自然，到郊外踏青游玩，这是清明节俗的另一项重要活动。

目前普遍认为，这一项清明节俗是继承了形成于春秋末期的三月上巳节传统。上巳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男女青年到野外踏青，自由择偶。

这首诗妙在未写清明的清冷。堪称自成一格，虽有清明，却意在纸外，写出怀春少女的幽情，一句“又是清明过了”，不禁让人要笑问：“可是愁嫁？”其意境清朗，颜色对比鲜明却不刺眼，诗人在夜里听乐看花，怡然自得，但绕着回廊行而复歇，却含蓄点出了此闲适后诗人的真正心意。



3月24日赴长安调研

2015年三四月份，市地方志办公室分别由主任冯艳阳和副主任张帜带队，先后赴我市各区县调研，了解相关情况，协调解决突出问题，指导和督促二轮修志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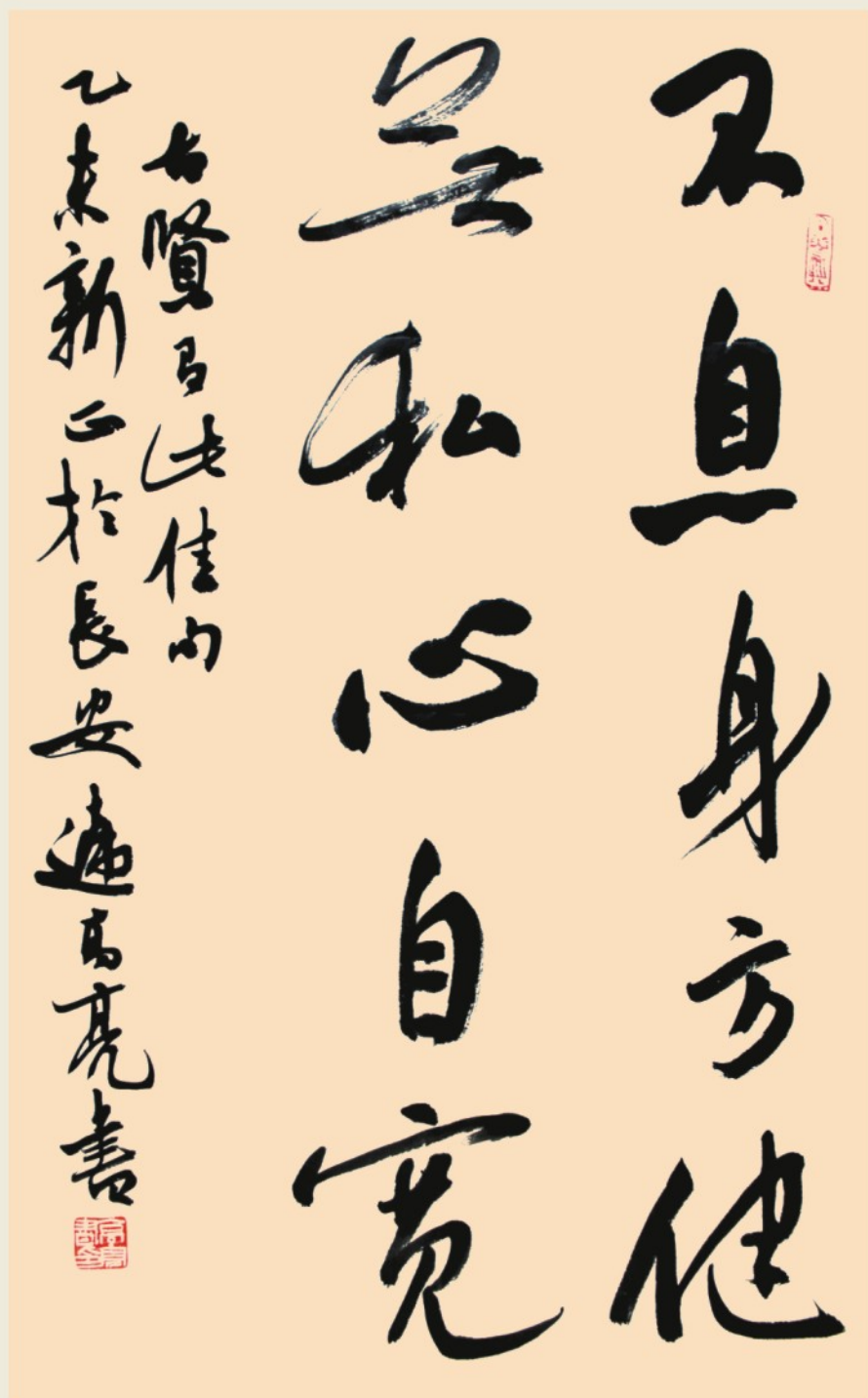
3月26日赴蓝田调研



3月31日赴未央调研



4月2日赴莲湖调研



遼高亮，字其鸣，号仰止阁主。陕西华阴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公安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书法作品曾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首届楹联书法大展、首届扇面书法大展、全国第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获得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提名奖，公安部第八届“金盾文化工程奖”艺术类一等奖，被评为陕西省政法系统书画“十杰”和陕西公安文化“十佳人物”。作品被国内外十余家博物馆收藏。